

学校代码: 10270

学号: 112200203

上海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论 文 题 目 张浚与南宋初期政治军事演变关系研究

学 院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专 业 中国古代史

研 究 方 向 宋 史

研究生姓名 陶萍萍

指 导 教 师 黄纯艳教授

完 成 日 期 2014 年 5 月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对本研究的启发和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做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陶萍萍 日期：2014.5.24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上海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手段保存论文。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陶萍萍 导师签名：黄纯艳 日期：2014.5.24

本论文经答辩委员会全体委员审查，确认符合上海
师范大学硕（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要求。

答辩委员会签名：

主席（工作单位、职称）：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陈江

委员：

陈大为

姚满朝

导师：

黄纯艳

论文题目：张浚与南宋初期政治军事演变关系研究

学科专业：中国古代史

学位申请人：陶萍萍

指导教师：黄纯艳

中文摘要

张浚，南宋初期抗金斗争的重要人物，其一生的活动与南宋初期政治军事演变息息相关。

在南宋初期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张浚的仕途晋升与建炎政治变局息息相关，张浚经略川陕的一系列决策及其拜相、贬黜之路也与南宋初期的政治军事演变紧密相连。张浚因在平定苗刘之变中首倡大举，调令各路勤王之师，稳定建炎政局而晋升，并入朝执政；又因力言中兴而经略川陕，其在川陕战区的军政决策，主要是为了遏制地方武将势力的扩大，保证中央权力在地方的行使，但也造成川陕战区宋金战争形势的恶化，对张浚本人以及整个南宋政权都形成冲击；再因平定杨么、措置两淮，改变两淮战场的宋金战争形势而拜相，却又因淮西兵变而罢官离朝，淮西兵变是张浚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点。此后，高宗对金的态度由且战且和转变为屈辱求和，而张浚终高宗一朝也未完成其中兴之计。孝宗即位，立志恢复，是张浚人生另一个转折点，再起执政，兴师北伐，却因符离师溃而失败，终其一生也未成北伐之功。

本文以张浚生平活动为考察点，对张浚所参与的政治军事事件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文把张浚在南宋初期政治活动与政治军事演变关系如实表述，以客观认识张浚。

关键词：南宋初期;张浚;政治;军事;关系

Abstract

Zhang Jun, an important people, resists Jin Dynasty in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 His lifetime activities hav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evolution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ffairs.

Under the grim situation of domestic trouble and foreign invasion in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 Zhang Jun's promotion is related to political upheaval in the Jianyan period; A series of policy decision in management of Chuan-Shan area, being appointed Prime Minister and dismissed are tied up with evolution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ffairs. Zhang Jun, the first people, decides to deploy armies to quell the rebellion of Miao Fu and Liu Zhengyan for protecting the Emperor. As a result of his contribution in stabiliz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Zhang Jun enters into the ruling center. Then, he is urged to revive and requests to manage Chuan-Shan area.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measures is aimed to control local military officer's power, but it makes the war situation deteriorate between Song and Jin Dynasty, which has an impact on Zhang Jun and The Southern Song regime. Next, he is appointed as Prime Minister because of quelling the rebellion of Yang Me, managing the East Huainan Road and West Huainan Road and turning the tide in Two Huai battlefield. At last, he is dismissed and banished far away from the court due to Huai Xi mutiny which is a life turning point of Zhang Jun. From then on, Emperor Gaozong of Song changes his tune to Jin dynasty from coexistence of war and peace to suing for peace, and Zhang Jun doesn't complete his plans of reviving all the Emperor Gaozong Dynasty. When Emperor Xiaozong who determined to reviving successes the throne, Zhang Jun holds power once again, and masses troops for Northern Expedition but fails because of force disintegrating in Fu Li. He doesn't finish his Northern Expedition project all his lifetime.

This paper discusses chiefly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ffairs in which Zhang Jun takes part all his lifetime, and expects to form objective realization to Zhang Jun by describing exactly.

Key words:The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 Zhang Jun;Politic;
Military;Relationship

目 录

绪 论.....	1
一、研究缘起.....	1
二、研究现状.....	1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6
第一章 建炎政治变局中的张浚.....	7
第一节 张浚生平概述.....	7
一、张浚家世.....	7
二、张浚生平.....	10
第二节 张浚与“苗刘之变”.....	11
一、建炎初年政治军事形势.....	11
二、谋定“苗刘之变”.....	15
本章小结.....	20
第二章 张浚与川陕战区变局.....	23
第一节 川陕战区与南宋国家安全的关系.....	23
第二节 张浚主持川陕军政与战区变局.....	27
一、宣抚处置使职权分析.....	27
二、张浚的军政政策与“富平之战”.....	30
三、川陕变局——蜀口争夺战.....	35
本章小结.....	37
第三章 张浚绍兴升黜与隆兴执政.....	39
第一节 绍兴升黜事件.....	39
一、张浚拜相与平定杨么.....	39
二、收夺兵权与淮西兵变.....	42
三、绍兴罢相.....	45
第二节 张浚与隆兴政局.....	46
一、隆兴年间政局.....	46
二、隆兴北伐与符离师溃.....	48
本章小结.....	51
结 语.....	52
参考文献.....	53
后 记.....	57

绪论

一、研究缘起

两宋之际，是多政权并立时期，各政权之间矛盾激烈，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北宋末年，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被新崛起的女真族金政权灭亡，而腐朽的北宋政权，随着金军南下侵略打击，最终倒台。继而，康王赵构在应天称帝，改元建炎，建立南宋政权。新生的南宋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形势，即外有金军吞并之忧，内有流寇动乱之患。因此，南宋初期不得不通过一系列军事斗争来稳定政权统治，最终维持统治长达一百五十余年。这里，军事斗争在南宋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其中张浚领导的抗金斗争，更加不容忽视。

张浚，是南宋初期抗金斗争的重要人物，他一生经历了南宋初期多场政治军事事件。他的抗金斗争起着重要的作用，其跌宕的政治生涯也与当时许多政治事件相关联。因此，研究张浚与南宋初期政治军事演变关系，是了解南宋政治军事现象的重要环节。

二、研究现状

关于张浚的生平活动，南宋时期的杨万里的《张魏公传》（《诚斋集》卷一一五）、朱熹的《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张公行状》（《朱文公集》卷九五）及元代脱脱的《宋史·张浚传》均有详细记载，这三篇传记、行状是我们研究张浚的重要史料。

目前，学术界关于张浚的研究成果颇多，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据笔者所知，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关于张浚的研究论文仅有三篇，分别是柳定生的《张浚与虞允文》（《文史杂志》1942 年第 2 卷第 4 期）、元祐的《南宋抗金英雄张浚》（《成都晚报》1963 年 2 月 7 日）和嵇梦庵的《南宋名臣张浚》（《人生》1964 年 9 月 1 日第 332 期，后收录入《宋代人物与风气》，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 年）。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外关于张浚研究的成果日渐丰硕。在专著方面，主要是刘嘉的《张浚年谱》（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0 年），该文详

尽地按年月编排了张浚一生参与的重要事件,不仅汇集了大量张浚个人资料,还融入了南宋初年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信息,是研究张浚的重要成果,但由于年谱的文体限制,并没有全面深入分析。台湾学者蔡哲修的《南宋中兴名相:张浚的政治生涯》(东海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89年)对张浚一生事迹也详尽描述,但主要着重在政治活动方面。

关于张浚研究的论文,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张浚这一人物研究,现从张浚的功过评价、军政活动和易学思想方面将前人研究成果梳理如下:

(一) 功过评价方面

关于张浚的评价,主要是对其功过是非的判定。学界对张浚褒贬参半,对话激烈,主要是在杨德泉、方健和阎邦本之间。

一方面是对张浚功过完全否定的评价,认为张浚一生欺世盗名,毫无功绩可言。持这一观点者主要从张浚军事活动失败、个人品德低劣、对金和战态度方面论述。杨德泉《张浚事迹述评》一文,认为其在军事上,三战(富平、淮西、符离)三败,贻祸无穷,“虽死,不足恕”;在人品上,心胸狭隘、刚愎自用,杀曲端,害岳飞,属于欺世盗名之辈,而且宋高宗不能中兴,张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总之,张浚“一生无功可纪而罪不胜书”,并不是一个值得称颂的历史人物^①。方健《再论张浚——兼答阎邦本同志》赞同杨文观点,在荐引秦桧、忌害岳飞问题上完全归咎于张浚,个人品德上以恩怨为重,是非颠倒,并认为张浚的忠只是效忠赵构,并非为民族大义,是个集诸多矛盾于一身的人物,不值得肯定和赞颂^②。魏隽如《关于张浚的评价问题》一文,认为张浚军事指挥受“守内虚外”这一祖宗家法的影响,在对金和战问题上的立场是为取悦君主;在军事用人上嫉贤妒能,赏罚不分,不能听取正确意见,这都决定了张浚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失败^③。何忠礼《试论南宋孝宗朝初年与金人的和战——兼对张浚和史浩的评价》一文,主要论述了张浚和史浩对金和战态度,认为张浚是打着抗战旗号破坏抗战之人,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害十分严重。^④

另一方面是对张浚功过肯定的评价,认为张浚一生有过也有功,而且是功大于过的。持这一观点者主要针对张浚军事上失败、个人品德低劣等的辩驳。阎邦

^① 杨德泉:《张浚事迹述评》,《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年年会编刊。

^② 方健:《再论张浚——兼答阎邦本同志》,《岳飞研究》第四辑,岳飞研究学汇编,中华书局,1996年。

^③ 魏隽如:《关于张浚的评价问题》,《历史教学》1990年第12期。

^④ 何忠礼:《试论南宋孝宗朝初年与金人的和战——兼对张浚和史浩的评价》,《浙江学刊》1998年第6期。

本《对〈张浚事迹述评〉的几点商榷》一文对杨德泉《张浚事迹述评》提出质疑,指出在杀曲端问题上张浚“虽有过失,但并不是罪恶”,而推荐秦桧,是认识错误,而并非私交甚好;至于忌害岳飞问题,由于史料论据不足,并且史籍记载混淆,是值得商榷的问题。因此,他认为“张浚一生,有功可纪”^①。随后《对〈张浚事迹述评〉的几点商榷之二》一文进一步质疑,指出“三溃之辱”(富平、淮西、符离)原因复杂,不能完全归咎于张浚;例证阐述张浚是“忠心为国”,而非“托名恢复”;最后指出杨文史料取舍不当,而做出的不实评价;进一步强调“张浚一生是忠心为国的。虽然有过,但亦有功,而且是功大于过”^②。而《读〈再论张浚——兼答阎邦本同志〉》一文,再陈荐引秦桧是张浚认识上的错误;淮西兵变之责应由赵构、张浚共担;至于诏令岳飞班师,是赵构早有定谋,并非张浚奏议^③。总之,阎文的基调是肯定张浚一生功大于过的。另外,何尊沛《张浚 张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一书,简要描述了张浚一生事迹,也对其一生功过完全肯定,该书是四川文化历史普及性读物,其评价是完全站在赞颂立场,对张浚整体研究并不深入。

而王德忠《张浚新论》(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一文对张浚进行功过相参的评价,认为张浚是主战派代表,为南宋的恢复和振兴尽心尽力、贡献一生,但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及与曲端、秦桧的复杂关系确实是其一生污点,他认为对张浚的思想和行为要联系其生活的时代及阶级地位进行具体分析,要给予客观评价^④。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七卷第六十二章《张浚传》(陈振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主要是以时间为序编写了张浚一生主要事迹,对张浚功过的议论不多,但也比较客观。

(二) 军政活动方面

关于南宋初年的政治军事形势,任崇岳《南宋初年政局与绍兴和议——绍兴和议研究之一》和台湾学者蔡哲修《从“攘夷”到“尊王”(1127-1142)——“南宋偏安局面的形成”研究之三》都详细论述了其演变过程。

关于张浚的政治军事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平定“苗刘之变”,经略川陕和宋金“富平之战”以及隆兴北伐和符离之败方面。

^① 闫邦本:《对〈张浚事迹述评〉的几点商榷》,《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② 闫邦本:《对〈张浚事迹述评〉的几点商榷之二》,《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5期。

^③ 闫邦本:《读〈再论张浚——兼答阎邦本同志〉》,《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④ 王德忠:《张浚新论》,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

1、关于张浚平定“苗、刘兵变”

只论及张浚首建复辟之功，并得到高宗重用，成为执政大臣。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龚延明《岳飞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戈春源《韩世忠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虞云国《两宋历史文化丛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都有提及。笔者将着重论述张浚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张浚是在何种情势之下首建复辟之功的。

2、经略川陕和宋金“富平之战”

关于张浚与“富平之战”，主要讨论发动该战的时机问题、失败原因以及富平之战对宋金战局和南宋政权是否有积极意义的问题。华山《南宋初年的宋金陕西之战》一文，从兵力和地理位置方面论述张浚发动该战是选取有利形势并得到人民支持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各路部队未能密切配合，以及赵哲的临阵逃脱；该战之后宋金战争主要限于陕西四川一角^①。王曾瑜《宋金富平之战》一文，认为该战是张浚依仗宋军兵力的微弱优势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发动的会战；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张浚对两军实力的错误估计；该战并没有减轻东南的军事压力，对抗金斗争没有任何积极意义^②。吴泰《南宋初宋金陕西“富平之战”述论》一文，从战场的军事形势和宋军将官关系方面阐述了“富平之战”不具备同金兵决战的客观条件；他认为决战时机不利、宋兵本身弱点及宋军主帅战役指挥不当是失败原因；富平之战对南宋抗金斗争只有罪责可纪，无任何积极作用可言^③。刘树友《张浚与富平之战》一文从宋金两军分析该战局势变化，认为张浚的措置乖方是促使富平之战失败的主要原因，该战从根本上奠定了宋金以秦岭—一淮河为界的南北对峙的格局。^④

论及“富平之战”的积极影响，黄正林《南宋初年主战派经营陕西述论》一文，认为张浚发动富平之战在战略上是正确的，只是战术上的失误导致宋军失败，富平之败虽损失惨重，但并不是毁灭性打击^⑤。王云裳、邵洪兴《宋金川陕之战论述》认为富平之战，宋军先是局部取胜，最终则是全局性溃败，此战虽然一定

^① 华山：《南宋初年的宋金陕西之战》，《历史教学》1955年第6期。

^② 王曾瑜：《宋金富平之战》，《中州学刊》1983年第3期。

^③ 吴泰：《南宋初宋金陕西“富平之战”述论》，《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

^④ 刘树友：《张浚与富平之战》，《渭南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⑤ 黄正林：《南宋初年主战派经营陕西述论》，《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

程度上缓解了东南危机，但关中之地自此沦陷，西北精锐丧失殆尽。^①

笔者认为，讨论张浚与富平之战或可以从川陕战区局势与南宋国家安全方面来探讨。

台湾学者蔡哲修《张浚与川陕的经略（1129-1133）——“南宋偏安局面的形成”研究之二》（《大陆杂志》，1999年99卷第1期）与梁天锡《张浚执政兼宣抚处置使考》（《华冈文科学报》1993年第19期）两文，专就川陕宣抚处置使的事迹功过作探讨。

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一书，以南宋川陕边防地区为切入点，将区域政治演变置于整个南宋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透视南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并着重制度的实际运作。张浚作为川陕宣抚处置使所拥有“便宜行事”权力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演变被详细论述。本书对笔者研究张浚在经营川陕时期的一系列决策的制定与中央关系有很大启发。

3、隆兴北伐和符离之败

关于张浚再起执政和符离之战，主要讨论该战的失败归咎于张浚个人原因。吴世骏《“符离之战”述论》一文概述了战争的发展过程并分析了失败原因和影响，认为该战的失败是张浚“帅非其才”，贪生怕死，不熟悉下情而致^②。崔英超《论南宋孝宗朝“无恢复之臣”的原因——从主战派性格谈起》认为“孝宗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张浚志大才疏、好高骛远不能担任恢复之任^③。夏令伟《南宋张浚与史浩之争析论》一文，从国是之争、职权之争、处事之争方面讨论张史之争，并论及符离之败与张浚不可脱离的关系。^④

（三）易学思想方面

张浚在学术思想方面的主要著作丰富，保存至今有《紫岩易传》10卷、《中兴备览》3卷、《张忠献文集》10卷，其中一些学者对其易学思想进行研究。

关于张浚的易学思想研究主要讨论思想核心及对后世的影响方面。蔡方鹿《张浚的易学思想及其影响》一文，认为张浚把《易》作为载道之书，其易学重

^① 王云裳、邵洪兴：《宋金川陕之战论述》，《黑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② 吴世骏：《“符离之战”述论》，《南充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

^③ 崔英超：《论南宋孝宗朝“无恢复之臣”的原因——从主战派性格谈起》，《历史教学》2010年第4期。

^④ 夏令伟：《南宋张浚与史浩之争析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7期。

视义理并把义理建立在象卜卦爻的基础上,对张栻和朱熹两位理学家产生重要的影响,张浚易学在宋代易学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①。金生杨《宋代巴蜀易学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三章详细论述了张浚的易学思想,认为张浚的易学思想“既注重以心体《易》,又注重其用,其致用思想称为上继王安石、下启功利学派的重要思想”,但并没有引起后世学者的足够重视。黄洁钰《张浚〈紫岩易传〉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一文,介绍了张浚的生平、著述及学术渊源,对其释《易》的方法和易学思想进行了研究。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本论文主要通过对张浚的生平、生存历史环境及所参与的政治军事事件进行考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自己对史料的重新解读和诠释,将张浚的一生系统全面地展现给学者。本文研究重点将放在张浚的晋升之路与南宋初期政治军事关系和张浚经略川陕与川陕战局演变的关系之上,将张浚的政治军事活动放置于南宋初期政治军事大背景之下研究,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客观认识张浚。

研究方法:本论文需要对宋代文献、史料的对比、删选和梳理,即文献考据法;也需要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辩证认识,即历史辩证法;还需要对史料及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即历史比较法。

^① 蔡方鹿:《张浚的易学思想及其影响》,《周易研究》,2004年第1期。

第一章 建炎政治变局中的张浚

北宋末年，宋徽宗朝，蔡京当政，政治黑暗；童贯鼓吹开边政策，“结怨辽金、创开边隙”，招致金人南侵，“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在山河破碎之际，康王赵构于应天称帝，建立南宋王朝，是为宋高宗。南宋政权建立初期，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外有金人南下吞并之忧，内有流寇动乱之患，南宋政权危机四伏。在此情况下，南宋政权不得不依靠各方武将势力，通过军事斗争来巩固统治。建炎三年，武将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动摇高宗的皇权统治。在此忧患之际，张浚首倡勤王之举，联合众武将平定苗刘之变，稳定了建炎政局。张浚也因此深得高宗赏识，自礼侍入枢廷，位极人臣。

第一节 张浚生平概述

一、张浚家世

张浚（1097-1164），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关于张浚家世，前人有考证，张浚先祖乃唐朝宰相张九龄之弟张九皋，其祖籍也是从张九皋及其后世几经迁徙至张浚五世祖时定居汉州绵竹。张浚先祖也曾入仕为官，虽未福泽后世，但为官也尽职尽责顺利致仕以至天年。下文即将论述张浚徙居绵竹的经过以及绵竹张浚先世的情况，以观察张浚家族和先世对张浚人生的影响。

1、徙居绵竹

张浚远祖可追溯至唐朝宰相张九龄之弟张九皋。朱熹《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以下简称《张公行状》）载：“公讳浚，字德远，本唐宰相张九龄弟节度使九皋之后”^①。张九龄在唐代曾任岭南节度使，关于其家世起源，《新唐书·宰相世系二下》云：“始兴张氏亦出自晋司空（张）华之后，随晋南迁，至君政，因官韶州曲江。”^②而君政是张九皋曾祖，因此张九龄、九皋籍贯应该是韶州曲江。而后，九皋又因官职调任，从曲江迁徙到长安“除殿中丞”、

^① 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卷九五上《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以下简称《张浚行状》），《朱子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以下版本同），第4350页。

^② 欧阳修：《新唐书》卷七二下《宰相世系二下》，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681页。

“又迁尚书职方郎中”，后还“迁殿中监”，其为官“必信必诚，勤劳不遑”，终“积忧成痼，以疾亟薨于西京长乐里之私第”^①。张九皋之后又经后世辗转而徙居汉州绵竹。

张浚家族定居汉州绵竹是在其曾祖张文矩时，是九皋后世从长安经由成都转至绵竹并长期居住，因而张浚祖籍乃汉州绵竹。关于张浚家世迁徙过程，朱熹《张浚行状》有详细记载：“自九皋徙家长安，生子抗，抗生仲方，仲方生孟常，孟常生克勤，克勤生口，口生纪，纪生璘，即公五世祖。仕僖宗时为国子祭酒，从幸蜀，因居成都，寿百有二十岁。长子庭坚，以荫为符宝郎，后不仕。符宝之子即沂公也。沂公早世，夫人杨氏携三子徙绵竹依外家，遂为绵竹人。”^②可见，张浚五世祖张璘在任国子祭酒时候，为避黄巢之乱，跟随唐僖宗从长安逃往蜀中，之后转至成都，并在成都居住下来。后来，张文矩妻子杨氏因丈夫早逝孤苦无依，携带三个儿子迁至其母家汉州绵竹，从此定居绵竹。关于张氏徙居绵竹，张栻也提到，“高祖讳文矩，早捐馆舍。夫人杨氏，挈孤依外家于汉之绵竹”^③，可见，张浚家族在曾祖文矩时期入籍绵竹。

2、张浚先祖

前述张浚籍贯汉州绵竹，因而此处所指张浚先世也从迁入绵竹的曾祖张文矩开始追述。关于张浚先世大致情况，朱熹的《张公行状》有记载：张浚“本贯汉州绵竹县仁贤乡武都里，曾祖文矩故不仕赠太师沂国公，妣沂国夫人杨氏；祖絃故任殿中丞致仕赠太师冀国公，妣冀国夫人赵氏、王氏；父咸故任宣德郎赠太师雍国公，妣母秦国夫人计氏。”^④文献关于张浚曾祖记载不多，除了张栻提到“高祖讳文矩，早捐馆舍。夫人杨氏，挈孤依外家于汉之绵竹”之外，朱熹提到文矩赠太师沂国公，这些谥号是因为张浚后来显贵而受敕封，另外，《张公行状》提到文矩有三个儿子，但这里仅知道长子名絃，即张浚祖父。

张絃（997-1063），年少有大志，博览群书，“于书无所不通”^⑤，仁宗庆历元年（1041）举茂才异等，未中。当时，西夏与宋朝交兵，在国家危困之际，针对国家用兵之策，张絃上呈《御戎策》三十篇，主要阐述宋朝当今用兵之患在于“中

^① 李昉等：《文苑英华》卷八九九《殿中监张公神道碑》，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4732页。

^② 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卷九五上《张浚行状》，第4350-4351页。

^③ 张栻：《南轩集》卷三九《夔州路提点刑狱张君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0年。

^④ 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卷九五上《张浚行状》，第4350页。

^⑤ 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卷九五上《张浚行状》，第4351页。

原兵弱”，“藩境无调习之甲兵，无亲信之士卒”且“民困财匮，点科不息”，以致于兵出逾时，“边鄙有警无以御敌”，基于此，张浚认为应该设置一名属将，公选不拘官品的文臣为军谋，自辟属兵、自理财用，不受他人干扰和分权，“庶几事权归一戎，敌可遏而人民可苏也”^①。张浚也因此受到御史中丞鱼周询和宣徽南院使程戡的赏识，并由二人推荐而被授以将作监主簿之职，后又被程戡召置幕下，担任管勾都总管司禁勘公事一职。程戡经略高阳关时，再向朝廷举荐征召，张浚任职管勾本路机宜文字。后出任雷州知事，因在任除寇安民而于嘉祐五年（1060）迁任管干都进奏院。年逾六十即致仕归家，嘉祐八年十一月卒于家，谥忠定，封冀国公。

张浚父张咸（1048-1099），字君悦，元丰二年（1079）中进士及第。初入仕途，即调任扬州封津簿，又因举子之身而迁任仁寿县令，后再迁雅州百丈令，充担华州州学教授。元祐三年（1088），张咸因举荐而应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特科，其所作文章言简意赅，切中时弊，被评为第一，但因与当权者反对变法的看法相抵触而落选。绍圣元年（1094）九月，张咸再次参加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考试，“中其目，并集英殿策试”^②，被宋哲宗亲擢为第一名，“改宣德郎、签署成都节度判官厅事，转奉议郎”^③。元符二年（1099），张咸因病卒于成都普福僧舍，后封雍国公。

张咸有三位夫人，分别是任氏赠仙原、赵氏赠仙居、计氏赠仁寿并县君。计氏乃张浚生母，是张咸第三任夫人。张咸去世之时，张浚才四岁，其成长教育全依赖于母亲计氏。

张浚母亲计氏教育“方正有法”^④，对张浚影响颇深。幼时，计氏勤苦鞠育张浚，言传身教，张浚因此而“视必端、行必直、坐不欹、言不诞”^⑤，受到亲族乡党的称赞。张浚入仕为官之后，计氏对张浚的言行要求更加严格，稍有不当之处“必变色以示戒”，母亲的言传身教促使张浚忧国忧民思想的形成。绍兴年间，高宗任用秦桧为相而走上屈辱求和之路，被罢官离朝的张浚恨不能立即上书力言罢和议，但害怕连累年迈的母亲，计氏知道之后，便以张浚父亲“臣宁言而

^① 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卷九五上《张浚行状》，第4351页。

^② 王应麟：《玉海》卷一一六《元祐集英殿策制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151页。

^③ 杨慎：《全蜀艺文志》卷四七《奉议郎张君说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0年。

^④ 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卷九五上《张浚行状》，第4351页。

^⑤ 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卷九五上《张浚行状》，第4353页。

死于斧钺，不忍不言，而负于陛下”^①的话来激励他。当张浚被贬谪永州时，计氏开导张浚因忠直得祸，“汝无愧矣，勉读圣贤书，无以家为念”^②。由此可见，张浚母亲是个心胸宽阔又深明大义之人，对张浚一生影响深远。

二、张浚生平

张浚(1097—1164)，字德远，号紫岩，四岁时父亲去世，在其母勤苦培育之下品行端直、谨言慎行。张浚幼时家境清贫，十六岁才得以进入郡学，但他勤勉刻苦，深受郡学教授的赞赏：“张氏盛德乃有是子，吾观其文无虚浮语致远。为可量也。”^③因家境贫寒，至张浚弱冠之年才得以进入太学，政和八年(1118)中进士及第，调任山南府士营参军。靖康初，任太常寺主簿，张邦昌僭立，逃入太学中。

高宗即位后，张浚即驰赴南京，任枢密院编修官，后改守尚书虞部员郎，擢殿中侍御史，迁侍御史。建炎三年(1129)三月，因平定“苗刘之变”，被高宗任命为知枢密院事，“时年三十三，国朝执政自寇擎以后，未有如浚之年少者”^④。之后，张浚力言中兴、恢复之志，被高宗任命为川陕宣抚处置使，经略川陕，在川陕战区三年的军政决策，对张浚及南宋国家安全影响深远。绍兴五年(1135)二月，张浚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权至右相，“上以边事付浚”^⑤，视师湖广、两淮。绍兴七年(1137)，因淮西兵变罢相。后秦桧当政，因反对秦桧和议之举而被排斥，贬斥离朝近二十年。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南下入侵，迫于内外形势压力，高宗重新起用张浚。孝宗即位，即重新重用张浚，除少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封魏国公。隆兴元年(1163)，任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都督建康等路军马，锐意用兵北伐，酿成符离之祸。隆兴二年(1164)张浚再次罢相，除少师、保信军节度使之职，判福州居住，因张浚推辞，后改除醴泉观使，同年卒。关于张浚其人其事，下文将详细论述。

张浚一生娶两位夫人，“终身未置妾”，“初娶杨囡夫人乐氏……再娶蜀因夫人宇文氏，与公同志……先公五年薨，葬衡山，与公同兆异穴。生子男二人，长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五绍兴十六年七月壬申，北京：中华书局排印本，1988年（以下版本同），第2509页。

^② 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卷九五下《张浚行状》，第4428页。

^③ 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卷九五上《张浚行状》，第4153页。

^④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二建炎三年四月庚戌，第466页。

^⑤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二建炎三年四月庚戌，第1397页。

张栻，右承务郎、直秘阁；次构，右承奉郎”^①。张栻与张构为宇文氏所生。

第二节 张浚与“苗刘之变”

张浚入仕南宋以来，一直致力于为朝廷作贡献。在建炎年间政治变局之中，张浚凭借自己睿智和果决，联合吕颐浩、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勤王之师，平定苗刘之变，解除高宗之围，深得高宗赏识。自此，由礼侍入枢廷，开始其跌宕起伏、毁誉参半的仕官生涯。那么，张浚是如何解决这场危机的呢？

一、建炎初年政治军事形势

1、靖康建炎之际的政局

靖康建炎之际，由于金军挥戈南下，宋朝政局动荡不安。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二十五日，金人兵临汴京城下，城内混乱不堪，“（兵士）弃甲倒戈，狼藉道路，民人奔走，莫知所向”^②。在对金抵抗颓势下，宋钦宗却试图以两河诸州郡向金人投降，使得金人在毫无抵抗之下踏入汴京城，并大肆烧杀抢夺，“京城之外，坟墓悉遭掘出尸，取其棺为马槽。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以故数大疫，死者过半”，城内民不聊生，“街内有病未绝者，俄倾已被剔剥，杂猪牛马肉卖之。菜蔬已尽，惟取软者啖之”，一片惨绝人寰之象^③。靖康二年二月，金左副元帅宗翰（粘罕）和右副元帅宗望（斡离不）先后胁迫徽宗、钦宗赴金营，并宣布废黜二帝为废人，之后掳走后妃、王室、宗室、大臣等三千余人北去，北宋政权灭亡。南宋度正称：“靖康之变，其祸极矣，载籍以来未有若是其甚者也。”^④

金人灭亡北宋政权之后，企图建立傀儡政权，以作后图。北宋灭亡之后，金人考虑到自己“务广地而兵力不能周”^⑤，暂时无力统治整个中原地区，于是决定另立异姓政权作为傀儡统治，张邦昌就是金人最好的棋子。靖康二年（1127）三月初七日，金人册立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建立傀儡政权。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的儒士张邦昌，深知若是真正接受金朝册封，实乃僭越犯上，因而始终

^① 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卷九五上《张浚行状》，第4442页。

^②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六九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丙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以下版本同），第521页。

^③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六靖康二年三月十二日，第711页。

^④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六八六七之度正四《送张森晦甫序》，第123页。

^⑤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建炎元年二月丙寅，第39页。

不敢御正殿，不用天子礼仪，不受群臣朝贺，不立年号，并最终接受吕好问的建议，遣人赴东平府迎请康王赵构继承大统，并迎立哲宗废后孟氏垂帘听政，自己则退位称太宰。历时仅一月余的“大楚”政权落幕。

在政局动荡之际，宋高宗赵构在北宋遗臣及麾下将臣的推戴之下，建立南宋政权。赵构（1107-1187），宋徽宗第九子，宣和三年（1121）晋封康王。靖康元年，金人攻陷汴京时，康王赵构正奉命出使河北向金统治者乞和，途径磁州时，金军已经渡过黄河南下，鉴于金兵迫近，知州宗泽乞请赵构留守磁州组织抵抗。赵构认为金军已经包围京师，磁州也不安全，因而应从知相州汪伯彦之请，退还相州。时钦宗拜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汪伯彦、宗泽为副，命他们募兵进京入援。此时，宗泽即向赵构建议“直趋澶渊为壁，次第解京城之围”^①，而汪伯彦、耿南忠轻信金人议和之说，不赞成宗泽之请，而建议赵构移军东平，随后赵构派宗泽领兵万人进屯澶渊，自己决意直赴东平驻守。建炎元年（1127）春，赵构到达东平，随后高阳关路安抚使黄潜善、总管杨沂中、韩世忠、刘光世先后率兵归附赵构麾下，其兵马总数近十万，但仍然不敢向汴京进师救援。夏四月，宗翰（粘罕）退师北还，二帝北迁，张邦昌傀儡政权知道僭越时命不长，在得知康王仍在济州的消息，便派人迎请赵构继承大统，稳定时局。在张邦昌和朱胜非等北宋遗臣的劝请之下，五月，赵构于应天府登坛受命，改元建炎，建立南宋政权。

南宋政权建立之后，为了稳固统治，赵构任命颇负众望的抗战派将领李纲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纲上任后，即替高宗筹划重整朝纲，组织抗金，他反对向金投降，主张“一切罢和议，专务自守之策”^②。为加强抗金斗争的力量，他推荐坚决抗战的老臣宗泽出任东京留守，赴开封整修防御设施；着手整顿军政，并建议在沿江、沿淮、沿河建置帅府，实行纵深防御。李纲整顿军政的措施，有助于南宋朝廷支撑局面，尚能为宋高宗所接受。然而，他主张坚决抗金及反对投降活动，与主和派汪伯彦、黄潜善政见相抵牾，因此李纲在位仅 75 日即被劾罢，“刚所坐皆因潜善传胜非”^③。由于新生政权内部的向金妥协倾向明显，加上高宗的“恐金心理”，宋朝政局依然存在严重内忧外患，建炎初年的南宋政权生存异常艰辛。

尽管南宋政权向金妥协倾向明显，但受金军压迫的北方军民仍积极组织抗金

^① 脱脱：《宋史》卷二四《高宗一》，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以下版本同），第441页。

^② 李纲：《李纲全集》卷五八《议国是》，长沙：岳麓出版社，2004年，第741页。

^③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建炎元年八月乙亥，第203页。

斗争。建炎元年（1127）六月，宗泽任东京留守，知开封府，招聚义兵近 200 万，分署京郊 16 县，与金兵隔黄河对峙。除了李纲、宗泽所率的军队抗金斗争之外，北方各地以饥民和溃卒为主体的民兵，结成“巡社”、忠义民兵，进行规模不一的抗金斗争，其中著名的有红巾军、八字军、五马山寨义军和梁山泊水军等。这些义军给南下金军巨大打击，在宋廷官员投降或逃跑之后，常由义军坚守阵地抵抗金军，甚至从金军手中收复失地。北方义军的抗金活动，分散了金军南侵兵力，延缓了南侵势头，减轻了南宋政权的军事压力。

总之，建炎初年，南宋政权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一方面，北方金人随时南下，南宋政府无力抵抗，虽然有李纲、宗泽等主战将领，加上北方起义军的协助，但由于南宋统治者的一味妥协、力求求和，以图一时安逸，没有认识到金人一统中原的意图。另一方面，南宋政府对中原与江南都失去了有效地控制。有序的权力失控以后，必然另有无序的权力取而代之。这些失控权力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农民武装，一是流寇集团。建炎初年，主要是流寇集团扰乱政府统治，笔者初略统计，苗刘之变之前影响较大的流寇有：建炎元年七月，胜捷军校陈通作乱于杭州；建炎元年十一月，真定军贼张遇入池州，后犯江州；建炎元年十一月，军贼丁进围寿春府，十二月投归东京留守宗泽，次年九月宗泽死后再叛，复寇淮西；建炎二年正月，东平府兵马钤辖孔彦舟叛，渡淮犯黄州；建炎二年二月，河北贼杨进归降宗泽，宗泽死后复叛，众至数万，剽掠汝、洛之间；建炎二年五月，贼靳赛寇光山县，后犯通州；建炎二年六月，建州卒叶浓等作乱，寇福州；建炎二年八月，河北京东捉杀使李成叛，犯宿州；建炎三年正月，东京留守杜充遣岳飞、桑仲讨叛将张用于城南，其徒王善往救，张用、王善寇怀宁府，王善后转攻宿州，同年十一月叛降金朝，张用号称“张莽荡”，率部流窜至襄汉，复入江西。这些流寇集团，对南宋政权威胁甚大，因为平定流寇需要花费大量兵力、物力，这无疑削弱了南宋抵抗金兵的战斗能力。

2、高宗南渡与维扬之祸

宋高宗对金人是害怕的，这在他处理张邦昌事件上表现的淋漓尽致。张邦昌的僭越之举无疑有碍赵氏的皇家颜面，但在张邦昌还政之后，高宗并未进行追究，反而认为其“知几达变，勋在社稷”^①，同时害怕“异时金人有词”而“馭以王

^① 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一四，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6 年，第 1186 页。

爵”^①，甚至待他如当初哲宗对待元老大臣文彦博一样，“月两赴都堂”^②，可见礼遇之至。这都是高宗忌惮金人采取的无奈之举，因此在金人尽数北归之后，李纲等大臣极论其罪，高宗责降其安华军节度使，潭州安置。

正是由于高宗的“恐金心理”，在南宋初期，高宗对金一直采取消极抵抗，同时南退偏安一隅，这也助长了金军的侵略气焰，造成维扬（即扬州）之祸。建炎元年（1127）秋，金人再次分兵伐宋，高宗认为应天府不是久留之地，“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③，准备南渡建康，黄潜善和汪伯彦也主张南渡。当时，很多大臣反对南渡，主战派李纲则认为“起于东南，则不足以复中原而有西北”且“南人轻脆，遇敌则溃”^④，很难收复中原，迎回二圣。吏部尚书吕颐浩等人建议早行措置，并向黄潜善、汪伯彦建议先让淮南的官吏和百姓入山避兵，庙堂则阴作渡江准备，将重兵分别驻扎于淮河和长江一线，先与金兵夹淮一战，若不胜，再与金兵夹江一战，以此阻止敌人的南下，但黄、汪并没接受。相反，高宗等人偏激地认为只有南渡，才能安全，因而力排众议，将李纲等反对南渡之臣罢官，并下诏“有敢妄议惑众沮巡幸者，许告而罪之，不告者斩”^⑤，以坚定其必须南渡的决心。十月，高宗离开南京南下，当时杭州发生胜捷军校陈通作乱，楚州宝应县又先后发生御营后将军孙琦作乱和驻镇江士兵叛乱，眼见建康也不安全，高宗一行即决定驻留扬州，并在扬州重新开始安逸生活“禁中修造复兴，御前生活复作，宫中费用复广”^⑥，而在抗金军事上却不作丝毫防御准备，反而派遣王伦、宇文虚中等前往金朝乞和，企图将这种安逸生活稳定在扬州。

建炎二年（1128）七月，金朝分别派遣宗翰（粘罕）和宗辅（讹里朵），率兵南下追击高宗，企图消灭立足未稳的南宋政权；同时，派娄室部进攻陕西，以牵制川、陕方面的宋军。十一月，宗翰军和宗辅部主将宗弼（兀术）的军队先后攻下濮州开德府、滑州、相州、淄州；十二月，又相继攻陷东平府和大名府，知济南府刘豫降金。在金军步步进逼之时，高宗却任命投降派首领黄潜善、汪伯彦分别为左右相，面对金人的进攻毫无紧迫感，仍然做着议和的美梦。建炎三年（1129）正月，宗翰军攻陷徐州，先后打败韩世忠、刘光世的军队，以三千骑兵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建炎元年五月壬辰，第118页。

^② 脱脱：《宋史》卷二四《高宗一》，第444页。

^③ 脱脱：《宋史》卷二四《高宗一》，第447页。

^④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建炎元年七月乙巳，第185页。

^⑤ 脱脱：《宋史》卷二四《高宗一》，第449页。

^⑥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建炎元年十二月戊辰，第252页。

突入淮甸。二月初，金人破楚州，攻陷天长军，十万御营宋军在数百敌骑面前望风溃散，金军前锋迅速抵近距扬州城仅十余里的地方。高宗闻讯大惊，在御营司都统制王渊和宦官康履等五六人的陪同下，慌忙披甲乘马出逃，急至瓜洲，乘船南逃；黄潜善、汪伯彦在听说高宗渡江之后，“相视仓皇南驰。都人争门而出，死者相枕藉，人无不怨愤”^①。金兵到达瓜洲，时“民未渡江者尚十余万，奔并堕江者半之”，原先从扬州抢运出来的“金帛珠玉，积江岸如山”，因来不及搬运过江而全为金人所得^②。高宗由瓜州南渡至镇江，金人紧随其后，于是接受王渊“请幸杭州”^③的建议，命殿前都指挥使刘光世守镇江；命主管马军司杨沂中节制江东军马，驻江宁府；命尚书右丞朱胜非、礼部尚书张浚分别节制平江府和秀洲军马；命户部尚书吕颐浩往来经制长江防务，自己则由镇江出发，经由常州、平江府、秀洲，一路逃往杭州。

综上所述，建炎年间，南宋政权外有金人迅猛南下之扰，内有各地流寇纷纷动乱之忧。对于金军的侵略，高宗及其左、右相黄潜善、汪伯彦，没有进行积极抵抗，而是选择求和、逃跑路线，最终造成维扬之祸。在南逃过程中，由于处置不当，造成武将苗傅、刘正彦兵变，危及高宗的政权统治。

二、谋定“苗刘之变”

建炎三年（1129）二月十三日，高宗到达杭州，为防止金兵过江，高宗任命吕颐浩为签书枢密院事、江淮两浙制置使，令其还屯镇江，不久兼任知江宁府，以主持长江防务。当时，高宗已经遣朱胜非、张浚、王渊在平江，御营中军统制张俊往吴江，大将杨沂中守金陵，刘光世守京口，而韩世忠在海道未还，“扈驾者为苗傅一军”^④以及先期护送皇子、后宫到杭州的御营司右军副统制刘正彦的军队。高宗驻留扬州以来，以内侍省押班康履为首的宦官骄恣用事、妄作威福，引起诸将及士大夫的不满。抵达杭州后，主张逃跑的王渊因与宦官勾结而升任同签书枢密院事，引起苗傅、刘正彦等人不满，遂密谋发动兵变，先斩王渊、再杀宦官。建炎三年（1129）三月五日，苗傅幕宾王世修伏击王渊，刘正彦以勾结宦官谋反的罪名将其斩首，后苗、刘率兵包围行宫，一面分兵捕杀宦官康履、曾择

^① 脱脱：《宋史》卷四七三《黄潜善传》，第13744页。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〇建炎三年二月癸丑，第392页。

^③ 脱脱：《宋史》卷二五《高宗二》，第493页。

^④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〇建炎三年二月庚申，第399页。

等，一面胁迫宋高宗传位于三岁的皇子赵昀，改元明受，迎请隆祐太后（即元祐皇后）垂帘听政，尊高宗为睿圣仁孝皇帝，居显宁寺，改称睿圣宫。苗傅升任御营使司都统制，刘正彦为副都统制。

1、苗刘之变起因

苗刘之变的发生与南宋初年的政治、军事环境息息相关。高宗即位后，南宋朝廷并未革除北宋时的各种弊政，而且在赵构妥协投降路线的影响下，出现权奸误国、宦官干政、将帅骄横等现象。

首先，建炎初期，自高宗下至文臣武将各级官僚，多各以私利为重，不思恢复，一味妥协投降。宋高宗面对金人南下没有抵抗的意志和决心。为保住皇位，高宗不支持抵抗派将领的抗敌斗争，也没有及时、有效地组织和领导各地自发组织的勤王队伍，而是在投降派的支持下，节节南逃；一些抗战将领也只顾私利、各怀其志，中书舍人季陵言：“今将帅位高身贵，家温禄厚，拥兵自卫，浸成跋扈之风。”^①又据《宋史》载，“先是，王渊装大船十数，自维扬来杭，杭人相谓曰：‘船所载，皆渊平陈通时杀夺富民家财也’”^②，“刘正彦尝招巨盗丁进，亦以赏薄怨渊”^③。军将以聚敛家财、请功邀赏，高官厚禄为重，而朝廷却未对此加以限制或引导，引起军将之间猜忌，弊端百出。因而，在面临金人南侵之时，将士上下不能团结合作制订完整的防御计划，甚至出现遇敌不战，盲目退却的现象，“帝在扬州，金骑掩至天长，光世迎敌，未至而军溃”^④。此外，各将帅不服从调遣现象严重，“去年御敌，尝遣王渊，桀骜不行；改命范琼，心怀怏怏”^⑤。将官如此，兵士更是散漫无纪律，张俊“自明引兵至温，道路一空，路民皆逃奔山谷”，韩世忠“逗留秀州，放军四掠”，即使高宗“亲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来”^⑥。由此看来，南宋初期军队没有统一的约束，从将帅到兵士均以私利为重，不听节制、各行其事，严重威胁到南宋的政治统治。

其次，宦官干政引起政治混乱。北宋建国后，宦官干政的现象得到遏制，但徽宗时，由于童贯等人深受徽宗喜爱，宦官又开始参与政事，“贯（童贯）握兵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四建炎三年六月乙酉，第493页。

^② 脱脱：《宋史》卷四七五《叛臣上》，第13803页。

^③ 脱脱：《宋史》卷三六九《王渊传》，第11487页。

^④ 脱脱：《宋史》卷三六九《刘光世传》，第11483页。

^⑤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四建炎三年六月乙酉，第493页。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五四《兵考六》，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11年，第4609页。

二十年，权倾一时，奔走期会过于制敕”^①，可见宦官干政的严重性。至南宋初，宦官在朝廷中仍有相当的势力和影响，“蓝珪、康履初皆为康王府都监、入内东头供奉官，常从康王使金人行营。及开元帅府并主管机宜文字……既即位，二人俱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大将如刘光世等多曲意事之”^②；“帝在扬州，金兵卒至，帝驰马出门，百官不戒备，从行者惟履等五六人。自是履等益自衒，愈有轻外朝心”^③；“比至杭州，江下观潮，中官供张，赫然遮道”^④。由此可见，在高宗即位后至一路南逃过程中，宦官对高宗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因此主张了其嚣张气焰。宦官干预朝政，恃宠用事，使中朝与外朝、将帅与宦官之间矛盾激化，苗、刘之变便是矛盾激化的直接后果，“中官之患，至此为极，若不悉除之，天下之患未已”。^⑤

2、张浚谋定兵变

建炎三年（1129）三月五日，在杭州行宫，苗傅、刘正彦命王世修在城北桥下伏击王渊，宣称他结交宦官谋反，刘正彦当场将其斩首，并派人围攻康履，分兵捕杀内官，凡无须者百余人皆被杀。随即，苗、刘拥兵至行宫北门外，陈兵待阵。宰相朱胜非等闻报后，责问专杀之由，苗傅自认为“不负国家，止为天下除害”^⑥，因为高宗“信任中官，赏罚不公，军士有功者不赏，内侍所主者乃得美官。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至此，犹未远窜。王渊遇敌不战，因交康履，乃除枢密。臣自陛下即位以来，立功不少，顾止作遥郡团练使。臣已将王渊斩首，中官在外者皆诛讫，更乞康履、蓝珪、曾择斩之，以谢三军”^⑦。苗、刘陈兵不退，后几经交涉，高宗迫不得已命吴湛率卫士将康履交给苗傅等人处置。在斩杀康履之后，苗、刘更进一步逼迫高宗退位，禅位给皇太子，请隆祐太后同听政事。随后，苗傅等退军移屯祥符寺，而高宗被迫移驾显忠寺。三月六日，太子赵昀即位，隆祐太后垂帘决事。于是，苗、刘控制了朝廷。在此危急关头，张浚首倡勤王之举，团结各军将士，平定苗刘之变，维护了高宗的统治。

张浚能顺利谋定兵变，主要体现在：第一，举兵平定兵变的决策及时、果决。

^① 脱脱：《宋史》卷四六八《宦者三》，第13662页。

^② 脱脱：《宋史》卷四六九《宦者四》，第13668页。

^③ 脱脱：《宋史》卷四六九《宦者四》，第13668页。

^④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建炎三年三月壬午，第414页。

^⑤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建炎三年三月癸未，第417页。

^⑥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建炎三年三月癸未，第417页。

^⑦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建炎三年三月癸未，第417页。

建炎三年（1129）三月十一日，改元为明受。改元赦书至平江及江宁时，张浚、吕颐浩闻知，当即决定联合和组织张俊、韩世忠、刘光世等从各地陆续发兵杭州勤王，抓住平定兵变的先机。当改元赦书至平江府时，礼部侍郎节制军马张浚即断测事变莫测，下令守臣汤东野封锁赦书消息以稳军心，随即遗书吕颐浩，“决策举兵”。^①

第二，张浚能抓住各领军将领的优势，团结各方实力，约合各将领迅速起兵勤王。吕颐浩“睹事明而刚决，闻国家之难，必先众倡议而起”，所以张浚首先约其共谋大事，张俊“纯实可与谋事”且“愿以死援君父之辱”，韩世忠“有仗节死难之志”，刘光世“兵力强悍、谋议沉惊”，因此张浚认为这三大将皆是可以依仗的勤王之兵，于是迅速约合各军分兵抵达杭州。^②

第三，动摇苗傅、刘正彦军心，离间苗、刘与王鈞甫、马柔吉等人关系。苗傅、刘正彦乃一介武夫，“学不足”且“素乏心机”，“每事取决于王鈞甫、马柔吉”，张浚即采取离间二人之计，斩断苗、刘羽翼而“后徐为之计”^③。一方面张浚集结勤王之兵，一方面遗书稳定苗、刘以防事情有变。当约合将领、部署好战略，张浚即遣人上书高宗请求复辟以内定政局、外御金骑，并遣冯轡到达杭州说服苗傅，试图以顺天顺德之理让苗、刘归顺，无奈二人已是骑虎难下。苗、刘虽派重兵扼守临平，但迫于内外压力，遂同意高宗复位。四月一日，“太后下诏还政，皇帝复大位”^④。至此，苗刘兵变失败。四月三日，恢复纪年建炎。是日，吕颐浩、张浚军队到达临平。苗、刘军队临平守将苗翎、马柔吉拒战不胜，苗、刘领二千兵连夜逃跑，后在韩世忠的追击下，苗、刘的势力彻底被消灭。

苗刘之变的平定，除了张浚首倡勤王之举，约合各将领举兵，占尽先机之外，赵氏政权的统治基础坚固，苗、刘二人的势力还不能与之相抗衡，因为“苗、刘没有明显的政治优势，也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⑤。自宋太祖建朝以来，即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赵氏政权政治基础相当牢固，即使经过“靖康之难”，南宋的政治统治基础并未削弱，赵氏“祖宗德泽二百年，今虽溃兵散卒为盗，未有一民奋臂其间者，戴宋之德，不可忘也。”^⑥可见，赵氏政权还是深得民心，苗、刘废立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一建炎三年三月丁亥，第425页。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一建炎三年三月丁亥，第430页。

^③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一建炎三年三月戊子，第427页。

^④ 脱脱：《宋史》卷二五《高宗二》，第464页。

^⑤ 刘焕曾、任仲书：《试论苗、刘之变》，《史学集刊》1990年第2期。

^⑥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一建炎三年三月辛丑，第445页。

之事实乃“得罪于天下后世”，终将以失败告终。

另外，张浚在平定苗刘兵变中能很好组织团结勤王之师、驾驭武将，这很符合宋朝“以文御武”的祖宗家法，也是高宗所乐意见到的局面，因此在平定苗刘之变后，张浚能得到高宗赏识，并担任枢筦之任。也正是这个原因，在后来处置武将问题的措施上高宗采取支持张浚的态度。

3、张浚与变后政局

张浚在此次平定之中，首倡议兵之举，乃勤王之兵的主盟，他以自己果决坚毅之举帮助高宗解决危机，深受高宗器重，因而高宗复辟之后，即擢升张浚中大夫知枢密院事，张浚随即进入宰执之列。苗刘之变的平定不仅是张浚仕途的转折点，也是南宋后期军事政治发展的转折点。

苗刘之变以后，南宋抗金斗争发生转折，即一味妥协逃跑转为与金军抗衡。苗、刘之变所打击的是支持和主张南逃的投降派势力，杀掉王渊、康履，谴责高宗对黄潜善、汪伯彦两人“误国至此，犹未远窜”^①。这体现人民强烈要求抗金，惩治投降势力的愿望。因此，兵变失败后，高宗迫于当时的局势，不得不做一些抗金的准备。“五月，戊寅朔，帝次常州……初，上问浚以方今大计，浚请身任陕、蜀之事，置司秦、川，而别委大臣与韩世忠镇淮东，令吕颐浩扈驾来武昌，张浚、刘光世从行，庶与秦、川首尾相应，帝然之。监登闻检院汪若海亦曰：‘天下若常山蛇势，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将图恢复，必在川、陕’，议遂决”^②。高宗遂诏令张浚为宣抚处置使，以川、陕、京西及湖南、湖北为所部，自己由杭州北上至建康，同时在军事上也进行必要的防御准备。高宗曾表示“朕与谋臣宿将，戮力同必以备大敌，进援中原”^③。高宗一系列举措稳定了人心，鼓舞了人民的抗金斗争。

苗刘之变的发生，使高宗认识到南宋政权内部威胁统治的因素，促使南宋政权进行政治整顿。这次兵变，直接起因是高宗赏罚不均引起苗、刘的不满。因此，必须坚持以“赏格从重，条约从宽”的原则，制订赏罚标准，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巩固南宋政权的统治基础的；其次，必须遏制宦官的权力，防止宦官干权乱政。建炎三年（1129）四月十日，高宗下诏：“自崇宁以来，内侍用事，循习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建炎三年三月癸未，第417页。

^② 脱脱：《宋史》卷四〇四《王若海传》，第12218页。

^③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建炎三年六月乙亥，第502页。

至今，理宜痛革。自今内侍不许与主兵官交通、假贷、馈遗及干预朝政，如违，并行军法。”^①南宋初期的宦官势力，经苗、刘之变的打击，基本消失殆尽，此后，南宋一直没有出现宦官干政的祸患。苗刘之变，宋高宗意识到武将势力的壮大必然危及自身的统治，因此遵循祖宗家法，削夺武将势力，以文臣统兵是高宗后期军事统治的重要举措。防止武将势力扩大，贯穿于整个高宗朝政治军事决策之中，甚至不惜以向金人屈膝求和为代价换取短暂的和平来抑制武将势力。这也是宋朝防止武将专权这一祖宗家法的弊病。而张浚能自礼侍进枢廷，也是因为其能“以文御武”，成为后来高宗打击地方武将势力，收夺武将兵权的得力助手。

本章小结

张浚生活在两宋动乱之际，外有金兵南下侵略之忧，内有各地流寇动乱之患，政治军事陷入混乱状态。新生的南宋政权，是北宋政权的继续，继承大统的宋高宗在建炎初期并没能很好的控制这种混乱局面。对于金人的南侵，高宗选择的是一味妥协、节节南退，企图通过求和来稳定统治。在主和派黄潜善、汪伯彦的主张之下，宋高宗的南逃举措，增长了金兵的侵略气焰，也造成了维扬之祸。而又因为对黄潜善、汪伯彦、王渊等人的处置不公、赏罚不明，以及南逃过程中宦官的作威作福引起诸将尤其是扈从统制苗傅等人的强烈不满，致使苗傅联合刘正彦发动兵变，迫使高宗退位，武将控制政权，使建炎年间政治混乱达到高潮。

在动乱年代，张浚作为一介文臣，凭借自己胆识和魄力，约合各路武将，平定建炎年间政治变局，解除了高宗的统治危机，使南宋政权免于沦陷的困境。正是因为能很好地联和、约制武将，“以文御武”平定兵变，而深受高宗赏识并被重用。

苗刘之变的发生，使宋高宗认识到建炎年间政治军事弊端显露，因而高宗决意改革，明订赏罚条格，防止宦官干政，以稳定自己的统治。这场兵变的发生使高宗认识到对金的妥协退让态度在当时行不通，开始准备抗金的军事防御。但是，苗、刘的叛变让高宗深刻认识到武将权势过大必然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因而压制武将、削兵权贯穿高宗政治军事统治政策的始终。为防止武将势力膨胀，以文臣统兵也是南宋初期抗金斗争中军事失利的原因之一。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二建炎三年四月丁巳，第473页。

建炎变局中，张浚由礼侍入枢廷，知枢密院事，辅佐皇帝掌管兵部。此后，开启了他对金抗战的一生。张浚掌管兵部之后，即主张经略川陕，南宋初期对金军事局势发生转折，由建炎年间对金的妥协求和转向大规模抗金斗争的高潮。

第二章 张浚与川陕战区变局

建炎变局稳定之后,南宋抗金形势有明显转变,宋高宗对金人的态度由之前的妥协退让转向为开始准备抗金军事防御举措。张浚知枢密院事后,即向高宗上呈抵御金军南下的策略,并要求亲赴川陕地区指挥抗金战事。建炎三年(1129)五月,张浚向宋高宗请求负责川陕抗金事务,并建议另派大臣,协助韩世忠防守淮东;调遣吕颐浩帮助张浚、刘光世“扈驾来武昌”,使淮东、武昌、川陕连成一线,挡住金兵攻势。高宗任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以川陕、京西、湖南、湖北为所部,“便宜黜陟”^①,“于兵民财无所不总”^②。因此,张浚成为川陕地区最高政治军事指挥官。张浚经略川陕三年,指挥富平之战等战役,对川陕地区甚至整个南宋初期的抗金斗争影响深远。本章主要分析川陕战区在南宋抗金斗争中的地位、张浚在川陕战区的主要军政策略与南宋初期军事管理体制的关系以及这种管理体制对宋金战争形势的影响。

第一节 川陕战区与南宋国家安全的关系

南宋川陕战区的地理位置,何玉红先生明确指出,其大致相当于今陕西省南部、四川北部、甘肃南部,即汉中盆地及其周边地区^③。这里地势独特、地位重要,是南宋与金、蒙长期对峙的前沿地带。南宋以川陕地区为兴复中原和保护东南的基地与屏障,金以该地为突破口南下侵占南宋。因此,无论对于南宋还是金,川陕战区都是至关重要的必争之地。川陕战区局势的发展,关系着南宋初期政治军事演变及宋金和战,影响甚大。关于南宋川陕战区战略地位的突显,何玉红先生《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一书,在整体防御战略的视野下,将川陕战区与其他战区进行比较,并同中央安全关系联系在一起,从南宋整体防御战略来审视川陕战区的重要性。^④

南宋川陕战区,是作为一个军事战略概念而言,其地理位置包括当时的陕西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三建炎三年五月戊寅,第481页。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八《郑亨仲欲并掌利权》,第96页。

^③ 何玉红:《整体防御视野下南宋川陕战区的战略地位》,《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9年第3期。

^④ 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五路和四川诸路，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陕西省南部、四川北部、甘肃南部，即汉中盆地极其周边地区。川陕交界地区地势险要，崇山峻岭，此起彼伏，关隘堡寨，矗立其间，是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在军事防御上的地位至关重要。

从南宋川陕战区与国家安全关系来看，要稳定南宋政权统治，首先必须占据川陕，以川陕地区作为抵御金军南下的屏障。建炎年间，金军南下侵宋，高宗南逃，企图安居东南，意欲以建康作为根据地，引起朝中上下议论。抗战派李纲极力反对，他认为“车驾巡幸之所，关中为上，襄阳次立，建康为下”，关中才是现今最佳驻跸之地，因为“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①。汪若海认为：“天下者，常山蛇势，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②他们明确指出川陕战区与南宋国家安全的关系，犹如人首之于人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川陕战区是南宋恢复中兴大业的基地。张浚认为南宋收复中原，实现中兴，当以川、陕为基地。在高宗南下扬州之时，张浚向高宗进言应当以中原、关陕为念，“时乘輿在扬州，浚言中原天下之根本，愿下诏葺东京、关陕、襄邓，以待巡幸”^③。建炎三年（1129年）五月，金人南侵，张浚“谓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遂慷慨请行”；七月，张浚出使川陕，行至兴元府即上奏：“窃见汉中实天下形势之地，号令中原，必基于此。谨于兴元积粟理财，以待巡幸，愿陛下早为西行之谋，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天下大计，斯可定矣。”^④在张浚看来，占据汉中，即可以拥有关陕精兵健马，可以依赖川蜀物资、荆襄财富，从而实现中兴大业。也正是因为川陕战区战略地位的重要，张浚认为只要依据“汉中之胜，背负巴蜀，左控关陇，西连氏羌，兵劲用饶，形利势必便，进可据上流之阻，退可以待四方之变……因宣抚之师，东向以收中原，一年而定关陕，二年而复大梁，不四五年而天下定矣”^⑤。因而，对于张浚出使川、陕，并请求高宗西巡，以号令中原的提议，也得到时人的支持，“奉迎大驾，西幸梁、秦，以图关中者，中兴之宏归

^① 脱脱：《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第11257页。

^② 脱脱：《宋史》卷四〇四《王若海传》，第12218页。

^③ 脱脱：《宋史》卷三六一《张浚传》第11297页。

^④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八建炎三年五月戊寅，第481页。

^⑤ 朱松：《韦斋集》卷九《上胡察院书》，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0年。

也”。^①

驻蹕之地的选择与南宋国家安全的关系。南宋初期,由于金军的逼迫,高宗一直南退,驻蹕之地一直在建康、绍兴、临安之间交换,定都之地悬而未决,直至绍兴二年(1132),高宗正式决定迁都临安。尽管南宋初期,迁都之议纷纷,但高宗始终选择驻留东南而不北上或西巡,把南宋政权稳定在秦岭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为稳定统治,南宋政权也建立一系列防御体系。南宋自建立之日起,就与金朝或战或和、长期对峙,并逐步建立川陕、荆襄、江淮三大战区。三大战区利用各区自然地理优势,各自设防,共同防御外敌的入侵。其中,川陕战区对保卫南宋国家安全作用至关重要。

从南宋初期与金战争、对峙的情形看,南宋守多攻少,始终处于防御状态,川陕战区在南宋防御体系中起到防御外敌、保护中央政权的作用,所谓“无蜀是无东南也”^②,川陕战区直接关系着东南的安全和中央政权的存亡。因此,南宋特别重视川陕战区的经略。第一,对于经略川陕的人选,南宋政府必要精心选拔,“有才而无识者,不足以为蜀帅;有勇而无谋者,亦不足以为蜀帅”,“付之以众人所不敢当之事,期之以众人所不能成之功”^③。第二,对于经略川陕的官员,权力之专、威望之高,也非一般地方官员可比。建炎三年,张浚出使川陕,高宗便给予其“便宜黜陟”的权力。对于此,时中书舍人季陵因论“遣张浚宣抚川陕,任太专,非是”^④而遭贬,这也证明高宗当时对于川陕经略的重视。

之所以如此重视川陕战区的经略,是因为川陕一旦突破,东南则岌岌可危,中央政权也就危如累卵。从张浚以宣抚处置使出使川陕,也证明南宋对川陕战区的重视,“夫宣威之设不于他路而独于蜀,兵将之易置不施之他路而独施之蜀,圣哲之心深知天下安危实系乎此,重此一方所以重国势也”^⑤。张浚经略关陕指挥富平之战失败,关陕尽失于金人,但从整体战略而言,“关陕虽失,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势牵制东南,江、淮亦赖以安”^⑥。因此,时人对于张浚出使关陕,即使没有尽收关中之土,但很好的保卫了东南和中央政权,还是给予肯定:“张浚之在陕右,实东南之扞蔽,西川之喉衿。虽未能攘除丑类,尽收关中之土疆,而可

^① 胡寅:《斐然集》卷一七《寄宣抚枢密》,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330页。

^② 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二四,四部丛刊初编本。

^③ 袁燮:《絜斋集》卷四《论蜀札子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0年。

^④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五建炎三年五月乙亥,第503页。

^⑤ 袁燮:《絜斋集》卷四《论蜀札子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0年。

^⑥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76页。

以控扼河山,牵制南侵之夷虏,其为朝廷屏翰,盖亦匪轻矣。”^①冯时行在绍兴初年上书岳飞时,也提到川陕战区的守卫与东南安全的关系,他认为“朝廷自渡江以来,十余年间,金人竭力相图,而终不得志”,是川陕与东南之间“势如柱石相扶,首尾相应”,“设使此虏今冬遂得川蜀,控带上流,俯视吴、楚,是犹一柱已摧,而余柱皆侧,其首已断,其尾可知……四川一失,东南利害愈重,不待言而可知”^②。也就是说,川陕战区一旦被敌军突破,东南安全也就难以保证,中央政权更是岌岌可危。

此外,从金军进攻策略来说,他们认为先进取陕西,平定陕西五路,占领南宋是指日可待之事。当金太祖下诏南伐时,关于进攻策略,金廷议论不一。河北诸将认为应“罢陕西兵,兵力南伐”,河东诸将不赞成,认为“陕西与西夏为邻,事重体大,兵不可罢”,时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完颜宗翰也认为陕西之兵不可罢,因为“初与夏约夹攻宋人,而夏人弗应。而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陕西而会师河北,彼必谓我有急难。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陕西,略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后取宋”^③。由此看出,当时金军对于川陕地区的重视,认为平定陕西,入宋即指日可待。南宋初年,在金军全面攻宋失败后,即改变进攻策略,将全面进攻改为东守西攻的战略部署,命右副元帅宗辅往洛阳治兵,将宗弼所率金军主力西调,企图集中力量,对川陕实施重点进攻,控制长江上游,进而控制东南,谋取整个南宋政权。如:富平之战、和尚原之战、饶凤关之战、仙人关之战等,都是金人为实现取陕入蜀、占领南宋目标而在川陕战区发生的大规模战争。从金军南下的军事策略也可以看出,川陕战区与南宋国家安全是息息相关的。

正是因为川陕战区战略地位的重要,南宋与金都将川陕地区视为必取之地。南宋初年,金军全面攻宋失败之后,即开始实行重点进攻川陕战区的战略,因此,南宋政府也派张浚全力经略川陕,以抵御金军对川陕的大规模进攻。而张浚此次经略川陕,对宋金战争局势有着深远影响。

^① 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三九《论张浚在陕右宜除副贰往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144页。

^②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四二六七《冯时行三之上岳相公书》,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317页。

^③ 脱脱:《金史》卷七四《宗翰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698页。

第二节 张浚主持川陕军政与战区变局

基于川陕战区在南宋抗金斗争中的关键性战略地位,为防御金军由陕入蜀威胁东南,建炎三年(1129)五月,南宋政府和平定苗刘之变之后,即派遣张浚担任川陕京湖宣抚处置使,并予以“便宜黜陟”的便宜之权,专任经略川陕之事,“于兵民财无所不总”。张浚在川陕主持军政,运用“便宜黜陟”之权,自辟属将,指挥宋金富平之战。由于宋军的失败,而使关陕六路尽入金人之手,导致四川完全暴露于敌人的铁蹄之下,宋金为争夺蜀口,在和尚原、饶凤关、仙人关等关隘发生激战,最终南宋得以保全全蜀。那么,张浚在川陕主持军政与川陕战区变局的关系是怎样,笔者将从以下几方面予以分析。

一、宣抚处置使职权分析

关于张浚任职宣抚处置使,台湾学者梁天锡的《张浚执政兼宣抚处置使考》一文,详细论述了张浚任职事件、便宜行事权限、指出张浚“滥用便宜,权侔人主”^①。宣抚处置使,是南宋中央为统一调度地方武力而设置的,其行事一切权力是代表中央。建炎三年(1130)七月,张浚从行在出发,高宗赐关陕官吏、军、民诏曰:“今遣知枢密院事张浚往谕密旨,黜陟之典,得以便宜施行。”^②这就是说,张浚出使川陕,拥有便宜行事之权,甚至可以“便宜黜陟”,自辟僚属。可见,宣抚处置使职权之高。“宣抚处置使,旧无有,张魏公(浚)始为之。”^③关于宣抚处置使,龚延明的《宋代官制辞典》这样解释道:宣抚使带“制置”二字者,得便宜黜陟属官,权任稍重于宣抚使,其余执掌同宣抚使,治所为宣抚处置使司。而宣抚使是宋代中央在地方设立的最重要的使职官员,掌管地方军事、行政事务,位高权重^④。宋人就曾讲:“祖宗以来,所置使名,莫重于宣抚,多以现任执政官充使。”^⑤从建炎三年(1129)五月出使到绍兴三年(1133)五月“始解使事”^⑥,张浚在川陕任职宣抚处置使四年,是川陕战区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其便宜行事之权主要分为:

^① 梁天锡:《张浚执政兼宣抚处置使考》,《华冈文科学报》1993年第19期。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五建炎三年七月庚子,第514页。

^③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一《宣抚处置使》,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36页。

^④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67页。

^⑤ 徐松等:《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一之二五,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

^⑥ 脱脱:《宋史》卷二七《高宗四》,第505页。

1、“便宜黜陟”之权，即承制除罢、升降官员的权力。无论是宣抚处置司属官还是地方政官抑或武将，都受其“黜陟”。

除罢川陕地方帅守、监司。建炎三年（1129）十月，除易川陕诸路帅臣，成都帅臣不兼利路：徙知熙州张深知利州，而以刘锡代之；知成都府卢法原不兼利路置帅；既而赵哲帅庆，刘锜帅渭，孙渥帅秦。同月，赵开同主管川陕茶马盐牧公事兼宣抚司随军转使，专一总领四川财富。建炎四年二月，徙知庆阳兼陕西制置使王似知成都，而以赵哲代之。^①

除罢川陕武将，包括都统制、镇抚使、总管、钤辖、统制及节制军马等。建炎三年（1129）闰八月，除曲端为宣抚处置司都统制；四年七月，罢曲端本司都统制。建炎三年闰八月，除王彦为利州路兵马钤辖；四年十一月，充金均房镇抚使；绍兴二年（1132），节制商虢陕华州（军马）。建炎四年九月，刘锡宣抚处置司都统制；十月，罢本司都统制。绍兴元年（1131）三月，王庶节制陕西诸路（军马）。绍兴元年五月，吴玠除秦凤路钤辖，统制和尚原兵马；十月，除泾原路副总管。绍兴元年六月，吴玠陕西路都统制；二年，除宣抚处置司都统制，节制兴、文、龙三州（军马）。

2、其他便宜行事之权，如增印钱引、制造度牒、派遣使节、置司类省试、封赐神灵等。张浚经略川陕，除了以“便宜”之权对地方官员、武将等进行任免与罢黜，还增印钱引、制造度牒、遣外交使节、置司类省试、封赐神灵等。

增印钱引：建炎三年十一月，张浚“以便宜增印钱引一百万缗以助军食，其后八年间，累增二千五十四万缗。浚又置钱引于秦州，以佐边用”^②。制造度牒：度牒，原是由礼部之下的祠部发放。张浚为宣抚处置使，“以便宜印造绫纸度牒，鬻之川陕、京西，以助军用”，至绍兴元年七月以闻，诏“日下住罢”^③；绍兴二年九月，张浚上奏：“仿朝廷体造绫纸度牒，为赡军修城垒戎器之用，或不如则，乞给降万道，俟至即罢。”^④遣外交使节：外交使节，原是皇帝钦命，建炎四年正月，“张浚遣谢亮使夏国”^⑤。置司类省试：省试即科举中的礼部试，每三年在京举行一次；而类省试即在非省试的年份，在行在及特区另举行特别试，资格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一建炎四年二月丙申，第614页。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九建炎三年十一月乙酉，第571页。

^③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六绍兴元年庚子，第822页。

^④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八绍兴二年九月辛未，第1008页。

^⑤ 脱脱：《宋史》卷二六《高宗三》，第476页。

与省试等同；川陕置司类省试始于张浚，“绍兴元年(1131)，当祀明堂，复诏诸道类试，择宪漕或帅守中文学之人总其事，使精选考官，于是四川宣抚处置使张浚始以便宜令川陕举人即置司州试之。”^①绍兴元年八月，诏：“宣抚司类省试五路举人，许依旧制别项考校，以陕西陷没，故优之也”^②封赐神灵：册封本皇帝独有之权，宣抚司也便宜行之。绍兴元年十二月，宣抚处置使张浚上奏：“已封永康军普德庙神为招惠灵显王，汉右将军张飞为忠显王。”^③二年四月，张浚言：“已加封梓潼县英显王‘武烈’二字。”^④

由此可见，张浚在川陕担任宣抚使时，其便宜行事之权触及军事、政治、经济、民事各个领域，范围之广、权力之大。因此，张浚行使便宜行事之权被时人“指以为僭”^⑤，以至于后来很多人在评价张浚时也认为张浚“滥用便宜，权侔人主”^⑥。诚然，张浚在行使便宜之权时，必要之时会越过中央之权，使得地方权力上升，也造成中央的猜忌。《文献通考》载：

张魏公以枢密使宣抚川陕，赵忠简谓之曰：“元枢新立大功，出当川陕，半天下之责，自兵事外悉当奏禀，盖大臣在外忌权太重也。”及魏公得罪，谪词言：“假便宜行事之制，忘人臣无将之嫌。肖内阁以招贤，拟尚方而铸印。”然则承制之事易以惹谤，忠简之言固笃论也。^⑦

这说明张浚在川陕战区权势过相当大，时“张浚在陕右，无敢言者”，“事任已重，处断太专”^⑧。然而，张浚在川陕战区能承制行事达四年之久，与高宗个人支持是分不开的，高宗曾高度评价张浚在川陕行事“张浚措置陕西，极有条理，荐人用士，持心向公”，“称善者久之”^⑨；最重要原因，是当时中央还能通过缩减宣抚使职权范围和增设副贰来控制 and 削弱宣抚处置使的权力，说明地方权力仍处在中央控制范围之内，一旦中央认为地方权力与中央权力造成冲突，中央即撤除和罢免来削弱地方势力，因此，张浚宣抚处置使之权始终还是处在中央的

^① 脱脱：《宋史》卷一五六《选举二》，第3626页。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六绍兴元年八月癸未，第834页。

^③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〇绍兴元年十二月丁卯，第885页。

^④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一绍兴二年四月乙酉，第935页。

^⑤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二建炎三年辛酉，第624页。

^⑥ 梁天锡：《张浚执政兼宣抚处置使考》，《华冈文科学报》1993年第19期。

^⑦ 马端林：《文献通考》卷五二《职官六》，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11年，第1509页。

^⑧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五绍兴三年五月辛巳，第1110页。

^⑨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二建炎三年辛酉，第624页。

控制之下，并没有“权侔人主”。绍兴二年（1132）九月，高宗曰：“浚孜孜为国，人多称誉，但闻蜀中士民流怨，人情不喜，盖军兴累年，赋调征役，不无骚动，缓急恐浚失助，宜遣人副其事”^①，这就表明张浚在川陕的权力已经造成中央的担忧，一旦地方权力与中央造成矛盾，张浚的罢免和宣抚处置使的废除就是必然之事。

二、张浚的军政政策与“富平之战”

张浚经略川陕最主要的目的是抵御金军进攻川陕、保住东南，张浚出行川陕前就说过：“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②这是因为，张浚认识到川陕战区在当时宋金战争的形势中的重要作用，于是自请任陕蜀之事。张浚此次出使川陕，可谓责任重大，时殿中侍御史赵鼎对他说：“元枢新立大功，出当川陕，半天下之责。”^③张浚出使川陕，高宗即命令浚“三年而后用师进取”^④。因此，张浚赴任关陕就开始整治武备、调遣将士，积极备战，“规以五年后出师”^⑤，说明张浚也是想准备充分后才与金人大战。但是，张浚到达陕西半年多就发动大规模对金作战——富平之战，并以宋军的失败而告终。富平之败，关陕五路尽陷于金，川蜀大门洞开，使得宋金战争中南宋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正是富平战役的失败，让时人对张浚经略川陕持批判态度，认为其“轻失五路，坐困四川，无分毫之功，有邱山之过，虽膏斧钺，未足以谢宗庙在天之灵”^⑥。那么，张浚经略川陕与富平之战究竟是怎样呢？

1、富平战前川陕情势（1127-1130）

本文第二章第一节已经分析，对于川陕战区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宋金两方都看的比较清楚，南宋初年双方在川陕战区的争夺战况非常激烈。

从金军方面看，建炎元年冬，宋高宗南逃扬州，金军就决定兵分东中西三路南下攻宋，分别是：东线的宗辅与宗弼自沧州渡河攻山东，中线的宗翰自河阳渡河攻河南，西线的娄室和撒离葛自同州入河攻陕西。建炎初期，金人打算以主力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八绍兴二年九月丙寅，第1006页。

^② 脱脱：《宋史》卷三六一《张浚传》，第11300页。

^③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五建炎三年七月庚子，第515页。

^④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六建炎四年八月癸未，第690页。

^⑤ 脱脱：《宋史》卷三七〇《刘子羽传》，第11505页。

^⑥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五七绍兴四年三月十五日乙丑，第1139页。

进攻东南，意图一举歼灭初生的南宋政权，而西线的娄室在川陕的战争，只是为了牵制川陕的宋军。但是，金军在东南的战争进展不是很顺利，尤其是建炎四年，宗弼率领金军南下追击宋高宗，高宗南逃海上，宗弼恐孤军深入，有腹背受敌之险，于是率领金军大肆烧杀抢掠之后北撤，在建康北部黄天荡遭到韩世忠部的截击，使金军大为受挫。而娄室在西线的战争节节推进，先后攻陷长安、凤翔府、陕州、华州、陇州、秦州等地，建炎四年（1130）三月，娄室又败吴玠于彭原店，曲端被迫从邠州退往泾州。这一时期，金军在川陕战区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也异常艰辛。而东南金军主力备受挫折，宗弼等人在东南一举歼灭南宋的意图受挫。金军全面进攻未能达到灭亡南宋的计划，于是改变策略将进攻主力由东南转向川陕战区，时宗翰即像金太祖建议：“前讨宋，故分西师合于东军，而陕西五路兵力雄劲，当并力攻取。”^①金军确定将进攻主力转向川陕战区之后，金军特令右副元帅宗辅为陕西主将，并抽调渡江南征失利的宗弼前往，意图全力攻陕，并由陕入蜀，控制长江上流，扼制南宋政府的咽喉以置其死地。

从南宋方面看，建炎年间，对于金兵南下进攻，南宋诸军“率望风奔溃”^②。但在川陕战区，陕西五路兵力雄劲，且有不少骁勇战将，如李彦仙、吴玠、吴玠、曲端、刘锜，在抵御金军进攻方面起到很大作用。李彦仙扼守陕西，“以孤城扼其卫再逾年，大小二百战，金人不得西”^③；吴玠于彭原店阻击金军，“撒离葛惧而泣”^④，曲端在陕西“有重名，陕西人为之语曰：有文有武是曲大”^⑤，而且“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⑥，这让金军在进攻夺取陕西战争中异常艰辛。尽管如此，金军还是迅速占领陕西长安、凤翔府、陕州、华州、陇州、秦州等地，陕西军情大震。因此，宋廷不得不重振川陕战区声势，建炎三年（1129），宋高宗派张浚经略川陕。七月，知枢密院事宣抚处置使张浚“以亲兵千五百人，骑三百”^⑦从临安出发，随行人员有：明州观察使刘锡、亲卫大夫明州观察使赵哲、参议军事刘子羽、主管机宜文字冯康国以及前军统制王彦所部“八字军”。十月，张浚抵达兴元府，开始积极从军事、经济方面整治武备。

^① 脱脱：《金史》卷一九《世纪补》，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409页。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二建炎四年三月戊子，第632页。

^③ 脱脱：《宋史》卷四四八《忠义三》，第13212页。

^④ 脱脱：《宋史》卷三六六《吴玠传》，第11409页。

^⑤ 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五《曲壮闵本末》，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180页。

^⑥ 脱脱：《宋史》卷五八《李纲传上》，第11257页。

^⑦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五建炎三年七月庚子，第514页。

军事上：首先，派遣随行统治官王彦率其“八字军”驻守金州、均州、房州一带，扼守中原与川陕相接地带，以防金军乘虚而入；其次，重用有才能的将领，提拔曲端为威武大将军、宣抚处置司都统制，任命刘子羽为宣抚处置司参议军事，擢用吴玠为统制、后升为泾源路马步军副总管，吴玠执掌帐前亲兵；此外，派遣将士收复部分金军占领之地，如环庆路经略使赵哲收复鄜延诸郡，吴玠收复永兴军。

经济上：张浚因赵开善于理财，承制任命赵开同主管川陕茶马盐牧公事兼宣抚司随军转使，专一总领四川财富。赵开积极支持张浚，以“蜀之民力尽矣，锱铢不可加”^①为由，在夔路大变榷酒法，“旧四川酒课岁为钱一百四十万缗，自是递增至六百九十余万缗”^②，在秦州置钱引务，兴州设铸钱司，“悉知虑于食货，算无遗策，虽支费不可计，而赢费若有余”^③。由于赵开积极筹措经费，保证了前线的军需，因此富平之战前“金银粮帛之运，不绝于道，年在山积”^④。

由此可见，富平战前，金军南侵的战略有全面进攻逐渐转为重点进攻川陕，并更换了川陕战区的金军主将，加强了川陕战区的兵力，将陕西视为“当并力攻取”之地。而此时宋高宗正南逃海上，为了减轻东南地区金军攻势，张浚决定在川陕宋军发动会战牵制金军，转移金军注意力，挽救东南危局。《宋史·张浚传》载：

浚既抵兴元，金人已取鄜、延。骁将娄宿孳引大兵渡渭攻永兴，诸将莫肯相援。浚至，即出行关陕，访问风俗，罢斥奸赃，以搜揽豪杰为先务，诸将惕息听命。会谍报金人将攻东南，浚命诸将整军向敌。已而金人大攻江淮，浚即治军入卫，至房州，至金人北归，复还关陕犹在。时金帅兀术犹在淮西，浚惧其复扰东南，谋牵制之。遂决策治兵，合五路师，以复永兴，金人大恐。兀术等出京西入援，大战于富平。

这段史料表明，张浚经略川陕战区的主要目的就是整治川陕诸军，抵御金军由陕入蜀，威胁东南。其实最终目的就是保全东南和南宋中央政权。此时，从宋

^① 脱脱：《宋史》卷三七四《赵开传》，第11598页。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八建炎三年九月辛丑，第565页。

^③ 脱脱：《宋史》卷三七四《赵开传》，第11599页。

^④ 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张魏公三战本末略》，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15页。

金形势发展来看,东南局势紧急。建炎三年至四年,金军南下追击,高宗逃至海上,南宋政权危在旦夕。因此,建炎四年(1130)九月,张浚才决定在陕西耀州富平发动会战,挽救东南危局。

2、张浚与“富平之战”

对于张浚的决策,时川陕诸多文官、武将反对者居多。大将曲端认为宋军“未尝习战金人新造之势,难与争锋,宜训兵秣马保疆而已,后十年乃可”,“万一轻举,后忧方大”^①;王彦说:“陕西兵将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则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阆、兴、洋,以固根本,敌入境,则檄五路之兵来援,万一不捷,未失大也。”^②吴玠也认为:“敌锋方锐,宜各守要塞,须其弊而乘之。”^③除武将反对外,“通判叙州眉山王尝献养威、持重二策,浚弗用”^④。属将刘子羽亦力谏不可战。从川陕战区一地安全而言,诸臣的顾虑不无道理,张浚也并非没考虑到,但是考虑到宋金战争局势对东南的威胁,他不得不发动战争,他曾对刘子羽说道:“吾宁不知此,顾今东南之事方急,不得不为是耳。”^⑤加上高宗亦有此意,“命浚出兵,分道由同州、解州以捣其虚”^⑥。因此,张浚发动富平之战,从宋金战争大局来看是必要的,黄正林先生也认为“发动富平之战,在战略上是正确的,由于战术上的失误才导致富平之战的失败”。^⑦

张浚既决定发动战争,就不得不弹压反对意见,对于反对意见极强的曲端,以彭原店失败为由罢其兵权,并投入秦州监狱。于是,张浚决策治兵,移檄河东向金左副元帅宗翰问罪。宗弼闻变,自京西星驰至陕右,与娄室等会。建炎四年(1130)九月,张浚合五路兵四十万,马十一万,会战于耀州。以熙河经略刘錫为都统制,与泾原经略刘锜、秦凤经略孙渥、环庆经略赵哲,各帅所部兵以从,“约以更相策援”^⑧,“又贷民赋五年”^⑨,集中大批军用物资随军调用。张浚命刘錫为前线最高指挥官,自己坐镇邠州指挥。大军行至富平县,吴玠就提出:“兵

^① 脱脱:《宋史》卷三六九《曲端传》,第11479页。

^② 脱脱:《宋史》卷三六八《王彦传》,第11452页。

^③ 脱脱:《宋史》卷三六七《郭浩传》,第11416页。

^④ 佚名:《宋史全文》卷一七下,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4页。

^⑤ 脱脱:《宋史》卷三七〇《刘子羽传》,第11505页。

^⑥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七建炎四年九月癸丑,第711页。

^⑦ 黄正林:《南宋初年主战派经营陕西述论》,《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

^⑧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四二建炎四年九月二十日乙未,第1034页。

^⑨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七建炎四年九月癸丑,第712页。

以利动，今地势不利，将何以战。”^①张浚未接受意见，执意约日会战。十四日，双方大战于富平，宗弼与娄室军队，分别从左右两侧夹攻宋军，持久不分胜负。于是，金人集中兵力直击环庆军，宋军诸路没有立即增援，而其主将赵哲却逃离所部军队，环庆军惊溃奔散，而其他诸军也随之而散，军备物资尽失，宋军大败，陕西为之大震。张浚听闻宋大溃，为了整肃军纪，他处死赵哲，将刘锡贬官合州安置之后，令陕西兵皆散归本路。既而张中孚、李彦琪、赵彬，相继降敌，金人乘胜向西进攻秦州、熙河等地，于是关陕五路皆陷于金，宋军在陕西只有阶、成、岷、凤、洮五州和风翔的和尚原及陇州的方山原两个据点，后因三人皆曲端心腹而归罪曲端并杀了他。

张浚在富平之战决策中，因罪杀赵哲、曲端而引起时人和后人诟病。曲端之死，“士大夫莫不惜之，军民亦皆恨，西人以是亦非浚。”^②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放在南宋历史大背景中看，就发现张浚的行为是维护宋朝抑制地方武将的祖宗家法而实行的。

宣抚处置使张浚所代表的川陕宣抚司是南宋中央在地方行使权力，而曲端、赵哲是川陕地区地方武将，并且地方势力愈发滋长。建炎三年（1129）闰八月，张浚承制拜曲端为威武大将军，充本司都统制，“端登坛，将士欢声雷动”，可见当时曲端在川陕地区影响力之大。在富平之战前后，张浚的决策得不到武将支持，表明中央权力与地方武将势力的矛盾突显，当地方势力威胁到中央的权威时，中央必须对地方势力进行压制，而张浚杀曲端就是这一矛盾不可调和的突出事件。张浚在川陕所从张浚决策之兵之时，即遭到武将的反对，尤以大将曲端反对最为激烈，为维护宣抚司在地方的权威，张浚不得不选择弹压曲端。富平之战中，曲端心腹，投降金人，造成陕西五路骤然陷于金人之手，张浚因以归罪贬谪曲端，时“陕西人倚端为重，及贬，军情颇不悦”，《西记事》也载：张浚夺曲端兵权，“西人为之失望”^③。曲端在川陕如此得众心，必然会威胁到张浚作为宣抚处置使在川陕的权力，也势必会影响中央在川陕的一系列决策，为将地方武力控制在中央，杀曲端是必然举措。对于赵哲，原因亦同。总之，张浚在富平之战中的军政决策是从维护中央政权出发的，“张浚杀曲端是为南宋中央解决地方武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七建炎四年九月癸丑，第712页。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六，建炎四年八月癸未，第691-692页。

^③ 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引《西记事》，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22页。

力问题”。^①

富平战后，宋金两国对内对外政策都发生变化。就金国而言，从建炎年间南下侵宋战争形势来看，金人意识到单纯依靠军事力量不能实现灭宋的目标，于是改变策略。建炎四年，金人在山东建立伪齐政权，作为宋金之间的缓冲地带，减轻东线的军事压力，而把主要力量放在川陕一带。富平战后，金军继续南下入蜀，企图占领川陕战区。就宋而言，富平之战“起了牵制金兵的作用”^②，南宋中央政府稍得喘息机会。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建炎四年（1130）到绍兴四年（1134），宋廷便不断派大军全面镇压全国各地的流寇、溃军起义。最后，除了洞庭湖的杨么外，其他较大流寇集团均被消灭或招安。从这一方面看，王曾瑜先生认为，“富平之战招致陕西的失陷，而对减轻东南承受的军事压力，实际上也不起什么作用，故而说不上任何积极意义”^③，是有失偏颇的。此后，宋金两方主要战争集中在川陕交界一带。

三、川陕变局——蜀口争夺战

富平之战，宋军只是被击溃并未被完全歼灭，张浚下令陕西溃兵皆散归本路，宋军尚存有一定的实力。时刘子羽建议张浚“留住兴州，外击关中之望，内安全蜀之心”^④，驻守关中，并“至秦州，访诸将所在……乃各引所部所部来会，凡十数万人，军势复振”^⑤。随后，张浚在川陕边界重新调整布局，“命吴玠聚兵扼险于凤翔之和尚原、大散关，以断敌来路；关师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巩，孙渥等聚泾原、凤翔兵于阶、成、凤三州，以固蜀口”^⑥。于是，蜀口成为宋金主要争夺对象。

绍兴元年（1131）三月，金军开始进攻川陕边界。和尚原是宋金争夺的第一要隘。这是因为，和尚原是进入汉中的重要关口，是“控扼川口必争之地”。时保守和尚原的是吴玠一军，他深刻认识到该地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和尚原最为要冲，自原以南，则入川路散，失此原，则无蜀也”^⑦，因此他“积粟缮兵，列

^① 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8页。

^② 华山：《南宋初年的宋金陕西之战》，《历史教学》1955年第6期。

^③ 王曾瑜：《宋金富平之战》，《中州学刊》1983年第1期。

^④ 脱脱：《宋史》卷三七〇《刘子羽传》，第11506页。

^⑤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九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寅，第741页。

^⑥ 脱脱：《宋史》卷三六一《张浚传》，第11301页。

^⑦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四绍兴十年三月丙戌，第2157页。

栅为死守计”^①。五月和十月，吴玠率军击退金人对和尚原发起的两轮进攻，并箭伤金军主将宗弼，杀俘金军数以万计，金人“自入中原，其败衅未尝如此”^②。

《金史》也记载和尚原之战的惨败：宗弼“攻吴玠于和尚原，抵险不可进，乃退军，伏起兵，且战且走，行三十里，将至平地，宋军阵于山口，宗弼大败，将士多战没”^③。和尚原之战，是宋对金作战一次巨大胜利，扭转了富平战败后宋军的颓势。战后，宋军重新建立起军事防线：刘子羽屯兴元、吴玠驻和尚原、吴玠屯河池、关师古屯熙河、王彦在金州。

绍兴三年（1133），金军陕西经略使完颜杲率军十余万，继续在川陕向南宋大举进攻，企图避开和尚原，从宋军防守薄弱的金州一线进攻，守将王彦因寡不敌众，被迫放弃金州，退守饶风关。刘子羽命田晟扼守饶风关，并急招吴玠自河池入援。但是，由于降将引金军“以祖溪间路出关背，乘高以饶风关”^④，使得宋军背腹受敌，宋军战败，饶风关失守。金军占领汉中，四川大震。饶风关战败后，王彦退守达州，刘子羽退守谭毒山，吴玠退守川陕接壤的仙人关。金军占领汉中，时刘子羽退走汉中时烧尽所有能资敌的粮草，金军“野无所掠，杀马而食，马且尽，遂杀两河签军食之”^⑤，金军想进入四川，但遭到刘子羽等利用谭毒山的地形，故垒死守，金军进而不能入蜀，而兵“死伤十五六，疫疠且作”^⑥，于是不得不引军北还。面对金军连续猛烈攻势，为固守四川，吴玠等在“川口仙人关侧近杀金坪，修置山寨”^⑦，死守仙人关。

饶风关一战，金军虽然胜利，但损失惨重，为了夺取四川，绍兴三年（1133）十一月，宗弼再次领军西来，攻克和尚原，并长驱直入杀金坪，深入川口。绍兴四年二月，宗弼与陕西经略使完颜杲、伪齐四川招抚使刘夔率骑兵十万，自和尚原一线，沿秦岭东下，大举进攻仙人关。时吴玠以万人守杀金坪，并接受吴玠的意见，在地势险要处筑隘设置第二道防线，以备退保。金军此次袭击势头迅猛，“自元帅以下尽室而来”，“鱼贯蚁附，决议取蜀”^⑧，决心夺取仙人关入蜀。面

^① 脱脱：《宋史》卷三六六《吴玠传》，第11409页。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八绍兴元年十月乙亥，第862页。

^③ 脱脱：《金史》卷七七《宗弼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754页。

^④ 脱脱：《宋史》卷三六六《吴玠传》，第11411页。

^⑤ 熊克：《中兴小纪》卷一四绍兴三年三月丁卯，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年，第170页。

^⑥ 脱脱：《宋史》卷三七〇《刘子羽传》，第11507页。

^⑦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二绍兴四年十一月癸丑，第1347页。

^⑧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六绍兴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己巳，第1413页。

对敌人的强劲势头，吴玠“拔刀划地，谓诸将曰：‘死则死此，退则斩’”^①。两军交战中，“矢如雨下，死者层积……明炬四山，震鼓动地”^②，可见，仙人关之战的激烈。但是，吴玠仍“以弱卒抗坚虏”之势，大败金军。此次战役，金军是抱着必夺蜀口的决心而来，“既不得志，遂还凤翔，授甲士田，为久留计，自是不复轻动矣。”^③

蜀口争夺战，实以宋军的胜利而结束。富平之战后，张浚任命吴玠坚守蜀口的策略是正确的，吴玠率领川陕宋军保全了全蜀，保卫了东南。此后，在川陕战区，宋金两军形成对峙局面。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分析张浚在川陕战区的军政决策与川陕战区的变局。以张浚为宣抚处置使为首的宣抚处置司在川陕战区的设立，南宋中央政权在川陕战区建立的一个强有力的军事指挥中心。作为宣抚处置使的张浚，经略川陕的军政决策，均是维护南宋中央政权在地方的统治权威。宣抚处置使在川陕战区拥有的一切职权，是南宋中央政府赋予的，而“便宜黜陟”等一切便宜行事之权，其范围之广、权力之大，归根结底还是南宋政府为实现在川陕战区的统治所采取地有效途径。

张浚经略川陕，在军事上是通过整治川陕诸军，在西部牵制金兵，以减轻东南军事压力，巩固南宋中央政权。基于此，在川陕战区诸将极力反对发动进攻的前提下，张浚执意发动富平之战。而在富平之战中，张浚一系列军政决策，都是基于维护南宋中央政权的统治权威而实行。张浚任命赵开为都转运使，总领四川财政，掌管川陕诸军粮饷的供应以及参与川陕军政事务。赵开总领四川财赋役，是为了节制地方武将的军需，防止地方武将势力坐大，并恢复南宋地方兵权与财权分离的祖宗家法。张浚在富平之战中，杀武将曲端、赵哲，也是为了维护南宋中央在地方的权威。以曲端为代表的地方武将势力，在川陕战区日益强大，曲端的“得众心”，已经阻碍南宋中央在川陕战区军事指挥权，曲端等武将反对代表中央的宣抚处置使张浚的军事决策就突出体现这一点。地方武将势力坐大，不利于中央在川陕战区的指挥还体现在，富平之战中，赵哲军的溃散，其他诸军争相

^① 脱脱：《宋史》卷三六六《吴玠传》，第11412页。

^② 脱脱：《宋史》卷三六六《吴玠传》，第11412页。

^③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四绍兴四年三月辛亥，第1221-1222页。

效仿，在斩杀赵哲之后，张中彦、赵彬等将的叛变，说明地方武将势力在地方的带领作用之强，若中央不加以控制，后果可能更严重，因此张浚斩杀赵哲，是地方武将势力与宣抚处置司权力矛盾的结果。张浚之所以能在川陕经略达四年之久，是得到高宗的支持，说明高宗在张浚削弱地方武将势力是支持的。

富平战败后，关陕五路尽失于金军之手，金军长驱直入，直抵川陕交界，蜀口关隘，成为这一时期宋金战争争夺目标，川陕战区的局势对宋军极为不利。张浚承制让吴玠扼守蜀口，固卫全蜀，是在川陕战区正确决策。吴玠率领宋军在蜀口争夺战中，打击了金军的气焰，金军“自是不复轻动矣”，于是宋金两军在川陕战区形成对峙局面。《宋史·张浚传》肯定了张浚经略川陕的军政决策：“浚在关陕三年，训新集之兵当方张之敌，以刘子羽为上宾，任赵开为都转运使，擢吴玠为大将守凤翔，子羽慷慨有才略，开善理财而玠每战辄胜，西北遗民归附日众，故关陕虽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势牵制东南，江淮亦赖以安。”

第三章 张浚绍兴升黜与隆兴执政

绍兴四年（1134）二月，张浚自川陕还朝，因富平之败而被劾罢知枢密事，谪居福州。九月，伪齐与金军渡淮南犯，张浚再次被起用为知枢密院事。绍兴五年二月，张浚升任右相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总中外之政，对内督战岳飞平定杨么，对外“往江上措置边防”，“西连陇蜀，北泊江淮，既加督护之权，悉在指挥之域”^①，都督诸路军马抵御金与伪齐的联合南侵。绍兴七年三月，因刘光世骄惰怯敌，张浚奏罢光世，以其兵属督府，以刘光世部将王德任左护军都统制、郦琼任副都统制，以兵部尚书、都督府参谋军事吕祉节制，郦琼不服王德居其上，遂率领四万人叛变投向伪齐，造成淮西兵变。九月，张浚因处置不当而罢相，提举宫观，后贬居永州。绍兴九年正月，宋高宗以宋金和议大赦，张浚复官，因多次上书反对高宗、秦桧与金议和，被排挤出朝达二十年。直至绍兴末年，宋金和议破灭，金军再度南犯，张浚才被任命措置两淮事务兼两淮及沿江军马，全面负责江淮防务。至孝宗朝，孝宗决心改变屈辱求和的政策，于是重用抗战派老臣张浚。隆兴元年（1163）正月，张浚再起执政，升任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积极备战北伐，收复中原，致使“符离之败”。宋孝宗在金兵的威胁下，抗金决心也就动摇起来。七月，张浚升任右相兼枢密使，不久，主和派汤思退升任左相兼枢密使，在太上皇宋高宗干预下，左相汤思退更加紧进行降金乞和活动，张浚见抗金无望，即求致仕，遂被罢相。隆兴二年八月，张浚病逝，后谥“忠献”。

第一节 绍兴升黜事件

一、张浚拜相与平定杨么

1、张浚拜相

绍兴四年（1134 年）九月，伪齐与金军渡淮南犯。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南宋对金人及伪齐军队作战形势有所逆转，使人看到恢复中原故土的曙光。十月，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五绍兴五年二月壬辰，第 1402 页。

高宗采纳新任宰相赵鼎的建议,“亲统六军,往临大江,决于一战”^①,这是高宗南渡后首次以主动姿态采取行动。宋军士气大振,韩世忠、张俊等部队取得一系列胜利,对此,高宗也异常欣喜,“韩世忠奏敌骑遁去,陛下必喜。上曰:‘此不足喜。若复中原,还二圣,乃可喜耳。然有一事,以卿等将士,贾勇争先,非复昔时惧敌之比,所喜盖在此也。’”^②

在抗金形势大好之下,高宗也接受宰相赵鼎的建议“今执政无如浚者”^③,重新任命张浚为知枢密院事,措置军务。张浚亲往江上视师,“与诸将会议,凡可克敌者,无不为之”^④。年底,金人退军北还。可以说,此时高宗对金的态度是以进攻为主,“辅臣进呈曲赦淮南事目,上曰:‘敌虽退遁,然南北之民,皆吾赤子,当示兼爱并容之意。中原未复,二圣未还,赦文不可夸大,第使实惠加于两淮百姓,乃朕指也。’又上曰:‘敌已退遁,循当渐图恢复,若止循故辙,为退避之计,何以立国?祖宗德泽在天下,二百年民心不忘,当乘此时,大作规模措置,朕亦安能郁郁久居此乎?’赵鼎曰:‘时不可失,诚如圣谕,事所可为者,谨当以次条画奏禀。’”^⑤可见,此时高宗仍有恢复意图。

正是基于对金人以进攻为主的作战态度,绍兴五年(1135)二月,高宗张浚升任右相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总中外之政。对内督战岳飞平定杨么,对外措置边防,都督诸路军马抵御金与伪齐的联合南侵。

2、平定杨么

上文提到,在富平之战后,南宋得到喘息机会,为巩固统治,高宗派大臣平定内寇,至绍兴初年,除荆湖地区的杨么势力以外,其余较大流寇集团悉已平定。关于杨么在荆湖地区扰乱南宋政权统治,一直是高宗的心头之病。绍兴四年时,江西布衣方畴上书:“方今之大患有三:曰金寇、曰伪齐、曰杨么。而杨么正在腹内,不可不深虑之,若久不平灭,必滋难图。”^⑥针砭时弊地提出,杨么之于南宋政权乃腹心之患,危害甚大。而且,“杨么厕金人、伪齐之末”“据重湖之险”,故“此贼不可轻”^⑦。因此,张浚任右相总内外之政后,高宗“始议浚以右揆出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一绍兴四年十月丙子,第1321页。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四绍兴五年正月壬戌,第1380页。

^③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一绍兴四年十月癸未,第1326页。

^④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三绍兴四年十二月戊戌,第1368页。

^⑤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四绍兴五年正月戊申,第1378页。

^⑥ 岳珂:《金佗续编》卷二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0年。

^⑦ 李纲:《李纲全集》卷一二一《与吕安老龙图书》,长沙:岳麓出版社,2004年,第1166页。

使湖外平杨么。”^①

高宗之所以急于派张浚平定杨么势力，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杨么驻寨荆湖洞庭地区，荆湖地区地理位置重要。杨么久据该地，不利于建都建康之议。在高宗锐意恢复之时，张浚又建议高宗以建康为都会，“以为东南形势，莫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但是“洞庭实据上流，今寇日滋，壅遏漕运，格塞形势，为腹心之海，不先去之，无以立国”^②。另外，杨么占据荆湖地区，阻碍东南与川蜀交通，乃咽喉之疾，必须早除之。“杨么之贼，名微众，寡据湖山之险，路阻吴蜀之通，流跳梁不息，或招外援，患虽微，图之，不可缓，比之于身，咽喉之疾也。”^③

其次，在宋高宗决议对金人以进攻为主的态势时，杨么暗中勾结伪齐汉奸李成等，配合金人南侵，准备南北夹击、扼杀刚建立不久的南宋政权，无疑引起高宗不满。为了不阻碍即将实行的抗金和恢复中原的计划，平定杨么迫在眉睫。绍兴三年（1133），“伪齐遣李成挟金人入侵，破襄阳、邓、唐、随、郢诸州及信阳军，湖寇杨么亦与伪齐通，欲顺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陆行，趋两浙与么会”^④。杨么与伪齐的勾结，与金人南北夹击南宋政权，无疑使得南宋抗金斗争面临严峻形势，针对此事，时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岳飞明确指出：“今外有北虏之寇攘，内有杨么之窃发，俱为大患，上轸宸襟。然以臣观之，杨么虽近为腹心之忧，其实外假李成，以为唇齿之援。今日之计，正当进兵襄阳，先取六郡，李成不就縶缚，则亦丧师远逃。于是加兵湖湘，以殄群盗，要不为难。”^⑤

绍兴五年（1135）二月，高宗命宰相张浚为诸路兵马都督，岳飞为荆湖南、北、襄阳府路制置使，率领约五万人马前往洞庭平定杨么之乱。至于平定之策，岳飞采用离间分化策略，因岳飞部下不善水战而招降杨么部将黄佐，离间杨么水军，后又让黄佐回到湖中招降杨么部众，以此争取敌方势力的，进而分化瓦解杨么集团。五月，朝廷急召张浚赴行在谋防秋之计，张浚认为杨么短期内不可攻取，恐耽误防秋之计决定暂且放下平定杨么事宜。岳飞“出图示攻讨出入之要”，认为“擒之易耳”，请求张浚“限八日破贼”^⑥。果如岳飞所言，六月初二日，“洞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三绍兴五年二月丙戌第1397页。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六绍兴五年闰二月辛酉第1421页。

^③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九绍兴十二年八月十日庚午，第1507页。

^④ 脱脱：《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第11381-11382页。

^⑤ 岳珂编、王曾瑜校注：《金佞稗编》卷一〇《乞复襄阳札子》，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41页。

^⑥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〇绍兴五年六月甲辰，第1497页。

庭贼杨钦将所部三千人诣岳飞降”，随后杨钦又劝降了全琮、刘洸等部，杨么军大部被瓦解，只有杨么、夏诚仍据寨自守。六月初十日，杨钦作为向导，率军进围杨么寨，杨么率众突围，力战失利，被俘后处死；夏诚死守其寨，亦被官军攻破。至此，“洞庭湖盗贼见已尽静”。^①

杨么集团的平定，荆湖地区内寇基本平息，“上流既定，则川、陕、荆、襄形势连接，势力增倍”^②，南宋政权在江南的统治趋于稳固。湖湘之寇平定之后，高宗认为“纾此南顾之忧，专意北事”^③，南宋政府即能一心进行抗金之事。随后，南宋在对金人和刘豫伪齐的战事中继续保持着主动进攻态势。

3、措置两淮

张浚在平定杨么之后，就坚决实行他的抗金决策。绍兴六年（1136）初，张浚决策出兵，收复失地。他任命韩世忠出淮东进攻京东东路，岳飞出襄阳直取中原。七八月之间，岳飞军队逼近西京洛阳，朝野大为振奋。为了鼓舞士气，张浚请求高宗驻蹕建康。此时正为金人兵强马壮之际，高宗的这个行动显然表明，他想有一番更大作为。十月，伪齐刘豫以三十万大军渡淮南犯，并虚张声势，诈称有金人助战。左相赵鼎对当前形势作出错误判断，欲令诸军退保长江，而张浚得知伪齐并无金人相助，力主合张俊、刘光世诸军予敌以迎头痛击。其后，因杨沂中的藕塘之捷和岳家军的驰援，伪齐军被迫北撤。在淮西之役中，张俊、刘光世的临敌表现却颇让人失望，伪齐兵初至，“俊、光世皆张大敌势”，“张俊请益兵”，“刘光世欲退师”，动摇军心，几乎断送淮右重地。^④

杨沂中在淮西的藕塘之捷，证明张浚力保两淮的决策是正确的，“自此两淮始可立矣”^⑤。此次措置两淮，张浚可谓居功至高，大得人望。

二、收夺兵权与淮西兵变

1、谋收兵权

张浚总之外之政以来，对内平定了杨么势力，稳定了南宋政权的内部统治；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〇绍兴五年六月乙丑，第1508页。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〇绍兴五年六月乙丑，第1508页。

^③ 沈与求：《龟溪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0年。

^④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〇绍兴五年六月乙丑，第1510页。

^⑤ 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二《郊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826页。

对外积极抗战，锐意恢复。在绍兴六年（1136），张浚措置两淮取得进展以来，认为目前内忧外患有所平定，于是积极“谋收内外兵柄”^①。宋代对于武将兵权问题，自祖宗以来就非常重视，如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并形成了“以文御武”的祖宗家法。建炎绍兴年间，南宋政权为对付金军、流寇与农民起义，不得不允许诸大将势力的坐大。建炎年间，苗刘之变无疑是武将势力坐大跋扈而导致的，对于此高宗铭记于心，因此，高宗对于武将兵权问题最忌讳，一旦时机成熟，收兵权就是必然之事。

正是由于当前内外形势大好，对于张浚主张收兵权，高宗无疑是支持。作为罢兵权第一个对象，刘光世在淮西之变中骄惰怯敌、不听节制，军无纪律，“未闻为朝廷措置毫发利便事”^②，这是高宗与张浚忌讳的。绍兴七年（1137）二月，高宗与张浚授以岳飞湖北京西宣抚使的重任，并通过岳飞向刘光世一道御札，要他“听飞号令，如朕亲行”，作出让岳飞率领淮西军北伐的假象。这样，既能稳定刘光世的淮西军，也能避免诸将的猜疑。此后，谋收刘光世兵权之举拉开帷幕。

2、淮西兵变

绍兴七年（1137）三月，刘光世被罢军权，其军队并没有归于岳飞，而是直属张浚的都督府。为了统治淮西军，张浚以刘光世部将王德任左护军都统制、郦琼任副都统制，以兵部尚书、都督府参谋军事吕祉节制。八月，郦琼杀死吕祉等人，遂裹胁四万余人叛变投向伪齐，造成淮西兵变之祸。

关于淮西兵变的原因，多数人认为是张浚措置不当而引起的，认为张浚任命不足以服众的吕祉和素有矛盾的王德、郦琼，必定会引起激变，“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则必争。吕尚书不习军旅，恐不足服众”^③。事实上，任命王德为该军都统制是秦桧和知枢密院事沈与求的主张：

（绍兴七年五月乙丑）初，刘光世之罢也，以其兵隶都督府，而秦桧与知枢密院事沈与求意以握兵为督府之嫌，乞置武帅，台谏观望，继亦有请，乃以相州观察使行营左护军前军统制王德为都统制。德，光世爱将，故就用

^① 熊克：《中兴小纪》卷二一绍兴七年四月癸丑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年。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四绍兴五年正月癸丑，第1386页。

^③ 脱脱：《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第11387页。

之。^①

对于这项任命，张浚持反对意见的，并“奏其不当”，但是秦桧以“督府握兵为嫌”^②的理由，使得高宗改变张浚的建议。由此看来，张浚在措置方面，已经力求避免冲突，反而是高宗措施失当占主要原因。^③

郦琼乃一介游寇，后归降刘光世并出任统制官，与王德素有嫌隙。关于这点，张浚是知道的，“琼与德素不协，祉还朝，琼与德交讼于都督府及御史台，乃命德还建康，以其军隶督府”^④，张浚及时将王德召回行在，显然是力图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但在王德与郦琼等将官的矛盾中，吕祉没有解决矛盾，反而偏袒王德，并向张浚“密奏乞罢琼及统制官靳赛兵权”^⑤，后被郦琼截得密报，非常恐惧。之后，杨沂中又未经周密部署，即“遣吴锡以兵往淮西，察其兵中动静。郦琼、王世忠等觉之，各有异志”^⑥。但由于张浚一直采取对武将采取不过份姑息的态度，又曾在富平之战以后将赵哲、曲端等斩首，所以郦琼诸将对张浚极其畏惧。因此，吕祉给张浚的密报被截获，直接激发了兵变。

淮西兵变，由于郦琼叛变伪齐，两淮防线上的淮西的大门洞开，致使两淮战略重地完全暴露在敌人锋芒之下；其次，郦琼裹胁四万人投向伪齐，使南军队失去全国兵力十分之一的精锐部队，这种损失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弥补。这无疑给高宗的此前对金进攻信心形成打击，也使他以后的主导思想也由主战转为求和。也正是因此，高宗和再任宰相赵鼎基本否定了张浚的进攻性军事战略，转而采取被动的防御性战略。这种策略的施行，完全是利敌弱我的行径。对金来讲，其承受的巨大军事压力得以舒缓，可以比较从容地组织、部署他们的军事力量；对宋来讲，诸将屯守淮海之上，实乃张浚之谋，及张浚追咎罢去，岳飞、韩世忠、张俊等诸路大帅失去了统一的领导，处于一种相对涣散的状态。而秦桧牢牢抓住时机，迅速崛起，高宗朝遂走上屈辱求和之路。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一绍兴七年五月乙丑，第1791页。

^② 脱脱：《宋史》卷三六一《张浚传》，第11305页。

^③ 闫邦本：《对〈张浚事迹述评〉的几点商榷之二》，《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5期。

^④ 脱脱：《宋史》卷三七〇《吕祉传》，第11510页。

^⑤ 脱脱：《宋史》卷三七〇《吕祉传》，第11510页。

^⑥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七八绍兴七年八月五日乙未，第1287页。

三、绍兴罢相

绍兴七年（1137）九月，张浚因措置失当而被罢相，以秘书少监分司西京，居永州。张浚被罢去之后，赵鼎再任左相。赵鼎并不是积极主战派，在张浚罢去之后，高宗朝对金态度逐渐由防守转为求和，这是当时宋金双方内外斗争形势决定的。

就宋方而言，淮西兵变之后，江淮防线已经洞开，加上张浚罢相，前线隔江失去统一领导，并不能积极组织抗金斗争。而此时的高宗见抗金大好形势出现逆转，也有当初主战转变为支持和议的态度。绍兴七年九月，王伦等渡河见完颜昌，传达了高宗关于“河南之地，上国既不有，与其付刘豫，曷若见归”^①的请求，得到允许。绍兴八年（1138）三月，秦桧任右相兼枢密使，积极进行降金求和活动，高宗朝遂走上屈辱求和之路。就金而言，金熙宗天会十五年（1137），在金内部主战派（宗翰等）与主和派（完颜昌等）的斗争中，主和派占据上风，因此对于伪齐政权的存在态度发生转变。伪齐是主战派支持建立的，但其力量过于脆弱，并没能起到金军所设想的缓冲地带和屏障的作用。为了消除与南宋和议的障碍，主和派要求废除伪齐。十一月，熙宗下诏废除伪齐政权，表示愿意与宋议和，以换得南宋的臣属。在此情况下，宋金议和趋势形成。绍兴十一年，宋金签订绍兴和议，宋金和议正式形成。在宋金议和环境下，张浚抗战主张再也不被高宗接受，期间张浚多次上书高宗主备战抗金，引起秦桧极其党羽的不满，并且被高宗以“今复论兵，极为生事”^②为由拒绝，于是张浚被排挤出朝达二十余年。直到绍兴年末，宋金和议关系破裂，张浚才逐渐被任用进行抗金事业。

关于张浚罢相，实际上与高宗对金态度转变有极大关系。绍兴五年至七年，随着宋军抗金形势的好转，高宗对金态度也进攻为主，于是他积极支持张浚措置两淮，“江淮事尽付张浚，倚之为长城”^③，并驻蹕建康，亲临前线，以表示支持抗战决心；然而，淮西之变后，宋军损失严重，高宗抗金信心备受打击，加上宋金战争形势趋于缓和，高宗即转变对金态度，对于主战的张浚态度明显转变，认为“张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国用，何尝得尺寸之地，而坏事多矣”^④，张浚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〇绍兴七年四月丁酉，第1782页。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五绍兴二十六年闰十月乙亥，第2887页。

^③ 吕颐浩著、徐三见点校：《吕颐浩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38页。

^④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六绍兴七年闰十月戊子，第1875页。

被罢就是顺理成章之事。

另外，张浚罢相与其主张收夺兵权也有关系。对于张浚主张收夺兵权，张浚实际上支持的，从高宗对张浚在川陕斩杀大将曲端、赵哲而未贬的态度可以看出来。防止武将专权，一直宋代祖宗家法，“以文御武”的思想始终贯穿高宗政治生活始终。但对于这次张浚收夺兵权造成淮西兵变，使高宗意识到其收夺兵权的时机还未成熟，这从高宗当时对岳飞的态度可以看出来。在处置淮西军的归属问题上，岳飞以“与宰相议不合”^①而解兵权归去，而高宗便一再下诏，“复令卿典军，任卿以恢复之事”^②，力促岳飞归军。因此，对于张浚收兵权而导致淮西兵变，为了稳定将士军心，高宗选择牺牲张浚。

第二节 张浚与隆兴政局

一、隆兴年间政局

1、绍兴年末宋金关系

自绍兴宋金签订“绍兴和议”以来，在秦桧极其党羽汤思退、万俟卨等求和势力的积极钻营之下，宋金保持着“和平”局面，高宗等人也沉浸在和平局面中，不思进取，国势逐渐走向衰落。直至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自汴京亲自领兵六十万分东、中、西、海路四路军南下侵宋，主力直指两淮战场，企图一举歼灭南宋政权，宋金二十年的“和平”局面被打破。

自绍兴和议之后，南宋军队一直处在将骄兵惰之中，并未积极备战。时主要战场两淮战场的形势对宋军极为不利。由于防守淮西的宋将统制王权不听指挥、拖延进军，致使金军“从容而进，如入无人之境”^③，不到半月，两淮尽失，金军直抵长江北岸，中外震惊，“举朝上下无不丧胆，直云：‘虏百万，何可当’惟有退走尔”^④。面临金军骤至，宋高宗又一次选择“遣散百官，浮海避敌”^⑤之策，但遭到左相陈康伯的坚决反对，“今日之事，有进无退”^⑥。无奈之下，高宗“遂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〇绍兴七年四月丁未，第1785页。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二绍兴七年七月丁卯，第1814页。

^③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四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乙酉，第3273页。

^④ 叶适：《叶适集》卷二九《题姚令威西溪集》，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⑤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三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丙辰，第3243页。

^⑥ 脱脱：《宋史》卷三八四《陈康伯传》，第11809页。

定亲征之议”^①。为抵御金军，宋廷命知枢密院事叶义问督师江、淮，中书舍人虞允文为参谋军士，但是叶义问根本不懂军事，因措置不当，轻易下令过江迎敌，造成瓜州失守，情势危急。与此同时，完颜亮亲率大军至西采石准备渡江。于是，高宗令李显忠代替王权负责长江防务，并派虞允文前往东采石犒劳军队。虞允文到达时，王权已经去位而李显忠未到，宋军士气低落，“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②，一片涣散。意识到形势危急，虞允文立即召集诸将，晓以利害，道“虏万一过江，而辈措足无所，虽走亦何之？今怯战亡走亦死，战亦死，等死，不如一战”^③，并激励士气“金帛、浩命皆在此，待有功”^④，后迅即整顿部队，并沿江布防。在士气大振时，李显忠赶来，迅速集结军队，挫败金军，取得采石大捷。

在完颜亮南侵之时，金内部发生政变，东京留守完颜雍在辽阳府即位，是为金世宗，很快金世宗就取得文武官员支持，并下诏废黜完颜亮，于是正处前线的完颜亮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但是，完颜亮在内外危机的处理上出现战略错误，他错误地估计了南宋的势力，试图在灭亡南宋之后，再回军对付金世宗，但在采石之战的失败，激起完颜亮军内部矛盾，在浙西兵马都统完颜元宜的领导下，发生兵变，刺杀了完颜亮。后金军都督府致牒南宋，称“正隆失德，师出无名……奉新天子明诏，已行废黜。大臣将帅，方议班师。各宜辑兵，以敦就好”^⑤。于是，金军北退，东线战事结束，但是宋金战争并未结束。

在完颜亮南下侵宋时，高宗迫于形势和朝中主战派压力，不得已复用张浚，任以判建康兼行宫留守，节制建康、镇江府、江州等地军马，主持长江下游防务。当他十二月下旬到任时，“采石之战”已结束，金帝完颜亮已被部下杀死，两淮金军也开始退兵。但宋金战争仍在进行中，宋高宗没有利用宋军在宋金战场取得优势地位，改变对金附属的地位，反而始终主张与金议和，所以并没重用张浚。绍兴三十二年五月，洪迈因“使金辱命”被罢，高宗下诏决定禅位，同时任命张浚专一措置两淮事务兼两淮及沿江军马，全面负责江淮防务。

2、隆兴年间政治形势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三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丙辰，第3243页。

^② 脱脱：《宋史》卷三八三《虞允文传》，第11792页。

^③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八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七日乙亥，第1711页。

^④ 脱脱：《宋史》卷三八三《虞允文传》，第11799页。

^⑤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五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己亥，第3287页。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太子赵昚即位,是为宋孝宗。孝宗即位,面临的宋金战争形势是高宗留下的和议局面。一直以来,孝宗目睹了南宋在宋金关系中的屈辱地位,对高宗和秦桧等党羽的屈辱求和行径极为不满,完颜亮南侵之时,“两淮失守,朝臣多陈退避之计,帝不胜其愤,请率师为前驱”^①,因此,孝宗早就心怀恢复大计。他的上台,意味着南宋对金态度可能会出现转变。

就金而言,完颜亮南侵失败之后,金世宗正忙于镇压契丹农民起义和黄淮地区的汉族人民起义,无力对南宋进行军事战争。因此,除了西线的川陕战区的吴玠仍与金抗战之外,宋金东、中线都暂时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至绍兴三十二年九月,宋金间的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金世宗基本镇压了北方起义,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南宋。十月,金朝以南宋不朝贡、不还旧疆为由命屹石烈志宁“经略宋事”^②,对南宋展开新的军事行动。

就宋而言,孝宗也积极准备恢复大计。首先,正式为岳飞冤案彻底平反,“复其官爵,禄其子孙”^③,并对秦桧构陷的其他冤案也给予处理,李光、赵鼎等去世的受害者,朝野人心为之一振;其次,选择支持自己恢复计划的大臣,而素抗战之名的老臣张浚和谋臣史浩是最佳人选,七月,孝宗召见张浚,道:“久闻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④并共商恢复大计,任命张浚为江淮宣抚使,向朝臣公开说:“朕倚魏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⑤;再次,孝宗继续任用高宗末年那些坚持抗金、政绩卓著的大臣,陈康伯、虞允文、张焘等都成为新班底的核心,胡铨、辛次膺等健在者受到重用,朝中的秦桧党人都被驱逐。孝宗一系列举措,都表明其决心恢复的志向。

二、隆兴北伐与符离师溃

孝宗锐意北伐,但对于北伐之事,时张浚和史浩持不同意见。史浩是稳健的驻守派,既不主张屈膝求和,也不赞成冒险北进,他建议孝宗“先为备御,是为良规”,主张巩固长江防线,等准备充分再图北伐;而张浚则建议孝宗亲赴建康,以动中原之心;用师淮甸,进舟山东;主张先城泗州,坚守两淮防线。显然,张

^① 脱脱:《宋史》卷三三《孝宗一》,第617页。

^② 脱脱:《金史》卷八七《屹石烈志宁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931页。

^③ 脱脱:《宋史》卷三九六《史浩传》,第12066页。

^④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〇〇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壬辰,第3391页。

^⑤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〇〇绍兴三十二年六月丁亥,第3409页。

浚的北伐主张颇合孝宗心意。

隆兴元年(1163)正月,孝宗任命张浚为枢密使兼江淮东西两路宣抚使都督江淮军马,具体负责用兵事宜。三月,金朝为收回海、泗、唐、邓、商诸州,致书张浚,以重兵相威胁,并遣蒲察徒穆及知泗州大周仁屯虹县,都督萧琦屯灵璧,“积粮修城,将为南攻计”^①。张浚以“至秋必为边患,当及时扫荡”^②,主张先发制人而攻取之,“会主管殿前司李显忠、建康都统邵宏渊亦献捣二邑之策”^③,于是越级向孝宗请求引兵北伐。张浚主张立即进行北伐之事遭到许多官员的反对,时武锋军都统制陈敏认为:“盛夏兴师,恐非其时。兼闻金重兵皆在大梁,必有严备。万一深入,我客彼主。千里争力,人疲马倦,劳逸既异,胜负之势先形矣。愿少缓之。”^④而督府准遣李椿以书遗浚子栻曰:“复仇讨贼,天下之大义也。然必正名定分,养威观衅,而后可图。今议不出于督府,而出于诸将,则已为舆尸之凶矣。况藩篱不固,储备不丰,将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练,节制未允,议论不定,彼逸我劳,虽或有获,得地不守,未足多也。”^⑤张浚皆不听,再次要求孝宗“降诏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⑥

隆兴元年(1163)四月,在排除左右陈康伯和史浩异议之后,张浚征得孝宗同意,绕开三省、枢密院,直接命令李显忠、邵宏渊等出战。北伐之初,宋军曾连连攻城克地,李显忠渡过淮河,收复灵璧,随后邵宏渊在李显忠率师帮助下攻克虹县。之后,宋军“乘胜进克宿州,中原震动,归附者日至”,宋孝宗称赞其为“数十年来无此克捷”^⑦。但是,在北伐取得初步胜利之时,宋军内部两将领之间发生矛盾,邵宏渊以虹县之复功不出己,又因“宏渊之卒夺其佩刀,显忠立斩之”,“二将益不相能”^⑧,以至于不能协调作战,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后来的溃败。

五月,金朝失去宿州后,遂派左副元帅绝石烈志宁率精兵万人反攻,宋金双方在宿州展开激烈争夺。由于张浚没能统一军队节制,造成号令不一,指挥混乱。作战中,李显忠与邵宏渊没有很好地配合两面夹击金军,反而以“当此盛夏,摇

^① 脱脱:《宋史》卷三六一《张浚传》,第11308页。

^② 佚名:《宋史全文》卷二十四上《宋孝宗一》,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86页。

^③ 脱脱:《宋史》卷三六一《张浚传》第11308页。

^④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〇〇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壬辰,第3397页。

^⑤ 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张魏公三战本末略》,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18页。

^⑥ 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张魏公三战本末略》,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19页。

^⑦ 杨万里:《诚斋集》一一六,四部丛刊初编本。

^⑧ 脱脱:《宋史》卷三六七《李显忠传》,第11431页。

扇于清凉犹不堪，况烈日中被甲苦战乎”^①动摇军心。是夜，李显忠的中军统制周宏率军逃归，其属兵纷纷逃跑，李显忠势孤难支，被迫从宿州撤军至符离，被金军击败，于是“大军并丁夫等十三万众，一夕大溃，器甲资粮，委弃殆尽。士卒皆奋空拳，掉臂南奔，蹂践饥困而死者不可胜计。二将逃窜，莫知所在”^②。随着符离师溃，孝宗朝恢复大计以失败而告终。

符离之败，张浚不得不提出辞呈，孝宗对张浚言道：“今日边事，倚卿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怀犹豫，前日举事之初，朕与倾任之，今日亦须与卿终之。”^③这表明，此时孝宗还不想立即放弃北伐计划。遂张浚降为江淮宣抚使，在海、泗、濠、滁等州部署防务，加强两淮守备，抵挡金军南下。

符离之战失败之后，宋金关系发生又由战转和。就金而言，在刚经历完颜亮南侵失败之后，军事力量尚未恢复，在占据宿州之后，并未趁机南下，而是加强外交攻势，企图恢复“绍兴和议”时期的宋金关系；就宋朝而言，经过符离师溃，朝中要求北伐的呼声越来越弱，主和势力抬头，迫于高宗压力，孝宗不得不重新任用主和派的汤思退。八月，张浚复任都督江、淮军马，同时采纳汤思退的建议，派淮西安抚使干办公事卢仲贤前往金军大营议和。

关于议和，南宋朝廷又展开激烈论战。张浚、虞允文、胡铨等强烈反对求和，张浚说：“自秦桧主和，阴怀他志，卒成逆亮之祸，桧之大罪未正于朝，致使其党复出为恶……今内外之议未定而遣使议之，诏已下失中原将士四海钦慕之心，他日谁复为陛下用命！”^④孝宗顿悟，准备放弃和议，无奈宋高宗的压力，不得不任命汤思退为左相，同时擢升张浚为右相，表明他未彻底打算放弃恢复中原的计划。隆兴二年（1164）四月，右相张浚“复谋大举”，但是遭到汤思退等人的阴谋弹劾，孝宗不得不罢去张浚的相位，出判福州。八月，张浚病卒于离京途中。

孝宗初年，由于完颜亮的南侵，宋金关系由和转战，在抗金形势大好的势头之下，张浚任枢筦之职，并帮助孝宗实行恢复大计。但是由于符离之战中措置不当，致使隆兴北伐以失败而告终。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〇〇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壬辰，第3389页。

^② 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张魏公三战本末略》，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21页。

^③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〇〇绍兴三十二年六月丁亥，第3412页。

^④ 佚名：《宋史全文》卷二十四上《宋孝宗一》，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02页。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阐述张浚在绍兴年间的贬谪事件和孝宗恢复年间再起执政。张浚自川陕回朝，由于富平之败被劾罢知枢密使事。但是，由于绍兴四年（1134）伪齐联合金军南侵，高宗擢升张浚为右相，专总中外之事。张浚在平定杨么之后，即“视师江上”，经略两淮，取得两淮战场抗金斗争的胜利，时人称“富平之失，此魏公也；后江上之胜，此亦魏公也！”在对内平寇和对外抗战都取得效果之后，对于武将骄奢怠惰、不听节制的“专权”之举，是南宋统治者最忌讳之事，正是由于张浚意识到这一点，才积极准备替高宗解除后顾之忧，实现“以文御武”的祖宗家法。于是“谋收内外兵柄”之事提上日程，对于此举高宗是支持的，但在罢刘光世兵权造成淮西兵变的问题上，张浚遂成为高宗稳定将士军心的牺牲品。

淮西兵变，可以说是高宗对金态度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说，前期高宗是且战且和的态度，淮西兵变即将高宗仅有的抗金信心扼杀了，张浚罢相之后，再也没有人能如此坚定地支持抗战。随着，秦桧入相专权二十余年，“绍兴和议”的签订，高宗朝遂走上屈辱求和之路，张浚也被排挤出朝达二十年。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打破“和议”，举军南侵，使高宗朝乞求的和平局面打破，迫于抗战压力，高宗不得不起用主战派张浚，以增强军心。但在击退完颜亮之后，高宗并未利用抗战的大好形势，改变南宋屈辱的地位，反而继续谋求与金人和议，失去抗金最佳时机。迫于形势压力，高宗选择禅位孝宗，谋求善终。

孝宗乃锐意恢复之君，其即位即迫切改变高宗朝屈辱求和的地位，于是制订恢复大计，平反高宗朝受秦桧等迫害之臣，力请张浚再入枢庭，共商恢复之举。隆兴元年，宋金形势在此转向战争，于是张浚力排众议进行北伐，却酿成符离师溃，孝宗迫于压力不得不与金达成和议，签订“隆兴和议”，张浚的北伐之举彻底破灭，遂于离京途中郁郁而终。

结 语

本文主要以张浚的一生活活动为主线,分析张浚自礼侍进枢廷的晋升原因,经略川陕的军政决策与川陕变局以及升黜之路与宋金形势转变的关系,讨论张浚与南宋初期的政治军事演变关系,因此本文显示出:

南宋初年,金军大举南侵,意图歼灭南宋,高宗的妥协求和之举,最终招致祸端。张浚在苗刘之变中,首倡大举,通过调令各大将士联合勤王,帮助高宗朝恢复,解决了高宗统治危机,同时稳定了南宋政权的统治。通过此举,张浚的“以文御武”之举解决武将危机,深得高宗赏识,从此担任枢筦之职,走入朝堂开启其跌宕起伏的仕宦生涯。

建炎末年,宋金关系主要以战争为主。张浚入枢廷之后,即力言中兴之举,并以宣抚处置使的身份,亲赴川陕战区,指挥抗金战争。宣抚处置使司,乃中央在川陕战区设立的统一指挥中心,目的是为更好地调度地方武力,控制地方武将势力。张浚在川陕措置之举,皆代表中央,其“便宜行事”之权也是为了中央权力更好地落实在地方。其在川陕战区的政治、军事决策,不仅是为了抗金斗争的需要,更是为了抑制地方武将势力的扩大,从这个层面来说,斩杀曲端、赵开是张浚为保证中央在地方权力行使的必然举措。富平之战的失败,张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以文御武”祖宗家法弊端造成的,以文臣统兵,指挥必然失当,当然这也与张浚作为文臣的实战经验不足有关。富平之败以后,川陕战区变局,对此时川陕战区抗金形势极为不利。

随着宋金战争形势的好转,增强了高宗抗金信心,张浚拜相,对内平定杨么之乱,对外视师江上,积极措防,两淮战场形势好转。但是,张浚帮助高宗谋收刘光世兵权,造成淮西兵变,却成了高宗安抚武将军心的牺牲品。淮西兵变也让高宗对金态度由且战且和转为积极求和,并在秦桧等人的积极钻营之下,宋金签订“绍兴和议”。自此,高宗一朝遂走上屈辱求和之路,而主战派张浚终高宗一朝也未再入朝堂。

孝宗即位,立志恢复,张浚再起执政,力主北伐,终因符离师溃而失败。可以说,终张浚一生也未成就其北伐之功,不得不说是个遗憾!

参考文献

一、基本文献：

- 1、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 年。
- 2、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 年。
- 3、脱脱：《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
- 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排印本，1988 年。
- 5、熊克：《中兴小纪》，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 年。
- 6、佚名：《宋史全文》，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年。
- 7、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 8、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
- 9、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6 年。
- 10、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11 年。
- 11、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 12、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0 年。
- 13、徐松等：《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 年。
- 14、岳珂编、王曾瑜校注：《金佗粹编》，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
- 15、岳珂：《金佗续编》卷二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0 年
- 16、王应麟：《玉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年。
- 17、周密：《齐东野语》，济南：齐鲁书社，2007 年。
- 18、胡寅：《斐然集》，长沙：岳麓书社，2009 年。
- 19、黄震：《黄氏日抄》，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
- 20、李纲：《李纲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04 年。
- 21、李昉等：《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66 年。
- 22、吕颐浩著、徐三见点校：《吕颐浩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年。
- 23、沈與求：《龟溪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0 年。
- 24、汪藻：《浮溪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
- 25、杨万里：《诚斋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 26、叶适：《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1961 年。
- 27、袁燮：《絜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0 年。
- 28、朱熹：《晦庵先生文集》，《朱子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 29、朱松：《韦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0 年。
- 30、杨慎：《全蜀艺文志》，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0 年。
- 31、张浚：《中兴备览》，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
- 32、张栻：《南轩先生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0 年。

二、今人论著：

- 1、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七卷第六十二章《张浚传》（陈振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 2、龚延明：《岳飞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
- 3、戈春源：《韩世忠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 4、黄宽重：《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年。
- 5、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年。
- 6、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 7、何尊沛：《张浚 张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年。
- 8、李之亮：《宋川陕大郡守臣易替考》，成都：巴蜀书社，2001 年。
- 9、沈起炜：《宋金战争史略》，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 年。
- 10、虞云国：《两宋历史文化丛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

三、期刊论文：

- 1、蔡哲修：《南宋中兴名相：张浚的政治生涯》，东海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89 年。
- 2、蔡哲修：《张浚与川陕的经略（1129-1133）——“南宋偏安局面的形成”研究之二》，《大陆杂志》1999 年 99 卷第 1 期。
- 3、蔡哲修：《从“攘夷”到“尊王”（1127-1142）——“南宋偏安局面的形成”研究之三》，《中兴史学》2005 年第 11 期。
- 4、蔡方鹿：《张浚的易学思想及其影响》，《周易研究》2004 年第 1 期。

- 5、陈世松：《南宋四川历任制置使》，《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 6、崔英超：《论南宋孝宗朝“无恢复之臣”的原因——从主战派性格谈起》，《历史教学》2010年第4期。
- 7、范立舟：《论南宋立国后的战略构想与军事部署》，范立舟主编《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9集，南方出版社，2002年。
- 8、方健：《再论张浚——兼答阎邦本同志》，岳飞研究汇编《岳飞研究》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 9、何忠礼：《试论南宋孝宗朝初年与金人的和战——兼对张浚和史浩的评价》，《浙江学刊》1998年第6期。
- 10、华山：《南宋初年的宋金陕西之战》，《历史教学》1955年第6期。
- 11、黄正林：《南宋初年主战派经营陕西述论》，《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
- 12、黄洁钰：《张浚〈紫岩易传〉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 13、金生杨：《宋代巴蜀易学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 14、李蔚：《张浚与陕西富平之战》，《西北史地》1981年第3期。
- 15、梁天锡：《张浚执政兼宣抚处置使考》，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26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77年。
- 16、梁天锡：《张浚执政兼宣抚处置使考》，《华冈文科学报》1993年第19期。
- 17、柳定生：《张浚与虞允文》，《文史杂志》第2卷第4期，1942年。
- 18、刘嘉：《张浚年谱》，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0年。
- 19、刘树友：《张浚与富平之战》，《渭南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 20、刘焕曾、任仲书：《试论苗、刘之变》，《史学集刊》1990年第2期。
- 21、任崇岳：《南宋初年政局与绍兴和议——绍兴和议研究之一》，《中州学刊》1990年第1期。
- 22、王曾瑜：《宋金富平之战》，《中州学刊》1983年第1期。
- 23、王德忠：《张浚新论》，《东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
- 24、王云裳、邵洪兴：《宋金川陕之战论述》，《黑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 25、魏隽如：《关于张浚的评价问题》，《历史教学》1990年第12期。

- 26、吴泰：《南宋初宋金陕西“富平之战”述论》，《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
- 27、吴世骏：《“符离之战”述论》，《南充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
- 28、夏令伟：《南宋张浚与史浩之争析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7期。
- 29、阎邦本：《对〈张浚事迹述评〉的几点商榷》，《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 30、阎邦本：《对〈张浚事迹述评〉的几点商榷之二》，《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5期。
- 31、阎邦本：《读〈再论张浚—兼答阎邦本同志〉》，《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 32、杨德泉：《张浚事迹述评》，《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年年会编刊。
- 33、余蔚：《论南宋宣抚使和制置使制度》，《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1辑。
- 34、元祐：《南宋抗金英雄张浚》，《成都晚报》1963年第2期。
- 35、嵇梦庵：《南宋名臣张浚》，《人生》1964年9月1日第332期，后收录入《宋代人物与风气》，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

后 记

值此论文落笔之际，心中感慨万千。三年时间犹如白驹过隙，转眼即将结束研究生生涯，心中有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更有对校园、老师、同学的不舍。研究生阶段是我人生中一段重要经历，它不仅促进了我学术的进步，更完善了我的思想，丰富了我的人生体验。

在三年的学习中，我得到导师黄纯艳先生的悉心指导。黄老师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做人、做事一丝不苟，让我由衷的敬佩，老师的为人和治学精神将伴随我在以后人生的道路上愈加坚定。感谢黄老师给予的学习机会和三年来对我的宽容、理解，犹记得论文定题、开题时，在我迷茫无思路时，老师耐心引导我挖掘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在撰写、修改过程中，老师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让我理顺写作思路，终于完成论文定稿，老师的辛苦我会铭记于心；感谢严耀中老师，有幸听完老师在上海师大最后一届《资治通鉴》课程，老师的精妙解说使枯燥的历史研究变得熠熠生辉，让我受益匪浅，也因此爱上历史研究；感谢曾维华老师，老师的《考古学通论》带我领略了中国古代器物的精美、艺术的精妙，老师的豁达人生态度更让我深受感触；感谢陈大为老师和姚潇鹤老师，在我论文开题和预答辩过程中提出的宝贵建议，丰富和完善了论文。

感谢谭静怡师姐在我学习和生活中给予的帮助，她做人的乐观和治学的求精精神让我钦佩；感谢周海宁师姐在我入学时给予的诸多指导和帮助；感谢同门朱欣昕、徐世康、刘玲清以及师弟师妹们的关心和帮助，同门之谊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感谢古代史的王秀波、周延、骆明发和室友秦泽芬，我们一起度过的三年喜喜忧忧，这份友谊是值得一生珍藏的记忆！

最后感谢我最爱的父母和家人，是你们的支持、理解和包容，我才得以安心完成学业，带着你们的殷切希望，我将继续坚定信念，努力探索人生新道路。